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In-depth Reporting

從搖籃到社會：像新二代這樣的臺灣人

From Cradle to Society:

Stories about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

陳浩寧

Hao-Ning Chen

學術指導教授：張錦華 博士

Advisor: Chin-Hua Chang, Ph.D.

深度報導指導教授：林照真 博士

In-depth Reporting Advisor: Chao-Chen Lin,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uary, 2017



誌謝



終於也走到了寫誌謝的這一天，雖然一度徬徨、焦慮，甚至好多個漫漫長夜都因論文而睡不好覺，但過程中卻有更多的開心、感動與成就感。

首先要謝謝張錦華老師與林照真老師專業與用心的指導，兩位老師絕對是我論文路上給予我最多幫助的人。謝謝錦華老師在我問題意識不清或是文獻理論不夠聚焦時，總是能給我方向，並透過討論讓我看見自己在理論上不足的地方。謝謝照真老師在採訪寫作上給我很大的空間，當我在採訪、寫作上遇到困難時，也不吝於給我支持與協助。也要謝謝兩位口委，曾熾芬老師與張正老師，不論是在學術上或是寫作上的意見與回饋，總是讓我受益良多。

再來要謝謝我的家人與朋友。謝謝爸比、媽咪、妹妹和外公一路上的支持與打氣，不論是親自開車載我去各地採訪，或是當我因寫論文而忙碌、焦躁時，給予我體諒與關心，都讓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感受到溫暖的陪伴，因為有你們不間斷的鼓勵與肯定，才讓我能順利完成。也謝謝親愛好友們的支持與陪伴，並定期關心我的論文進度。每次聚會都讓我能暫時從苦海裡解脫，跟你們抱怨論文絕對是過程中最舒壓的部分。

最後，要謝謝所有的受訪者。謝謝你們願意真摯地與我分享你們的生命故事，採訪絕對是寫論文中最快樂的部分。很榮幸、很感謝自己能夠被信任，並參與了這麼多深刻的故事。謝謝每一位受訪者的分享，希望藉由你們的故事，讓大家看到更多元的新二代面貌。



摘要



目前台灣的新移民第二代，人數已經超過 35 萬人。現在這群人被簡稱為「新二代」。其中，社會觀感差異最大的莫過於東南亞的新二代。

在本深度報導論文中，受訪的東南亞新二代多數超過 18 歲。透過他們的成長回憶，可以感受到兒時與現在的社會觀感，有很大的差別。早期有關東南亞新二代的報導，總是聚焦在他們的中文差、遲緩兒或是清寒苦讀的形象，無形中讓新二代貼上弱勢的標籤。近年來隨著新二代進入學校、社會的人數增加，再加上東南亞熱潮的興起，鎂光燈又再度轉向新二代。不同的是，這回他們成為搶手的雙語優勢人才。

除了新二代成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外，本報導也探討了他們在自我認同上的轉變與追尋，以及在南向熱潮後，新二代的處境轉變。

東南亞新二代一路走來，都曾感受到偏見與歧視。有些人選擇隱藏身份；有些人則正面回應。時至今日，多數的新二代們多認為社會環境已更加多元、友善，他們最終仍希望能去除標籤，成為一個不一樣、也一樣的普通人。

關鍵字：新移民、新二代、東南亞、新南向政策



Abstract



Amid the rise in new immigrants over the years, there are now over 350,000 second generation members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The public usually named these second generation, especially the ones whose foreign parent is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NSG)”. Public perception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s mired in controversy.

Media used to focus on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s, health conditions, or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and label them as the disadvantaged people that have poor language skills, mental retardations, and living in ba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there are more NSG go to school, get involved in the society, and the implantation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e NSG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alents in the country.

Many NSG grew up in an unfriendly environment that their relatives,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even strangers discriminated them. To deal with these kinds of unfriendly treatments, some of the NSGs chose to hide their identity; however, others faced it in a positive way.

The concept that NSG would express the meaning “We are the same, yet we are all special.” This in-depth report focuses on NSG that are above 18 years old and concerns the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SG’s internal struggle and self-identity on their way of growing up.

Fortunately, most NSG now think that the society becomes friendly and open to the diversity of human. Thus, NSG will be able to remove those labels made by misunderstanding.

Keywords: New Migration; New Second Generation; New Southbound Policy; Southeast Asia





第一章 新台灣之子難忘童年 1

不論是泰國人妖或是番仔，這些歧視性的字眼，都讓新二代在初次與同儕相處時，感受到自己的不一樣，和大環境的不友善。但他們也只能背起沈重的包袱，繼續向前行.....

第二章 我的媽媽不一樣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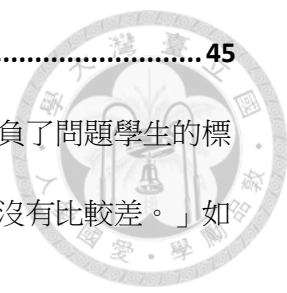
當新二代意識到母親的身份與一般人不同時，有些新二代視為理所當然；有些則排斥甚至討厭媽媽的身份。但不論是超人媽媽或是被隱藏的媽媽，在新二代心中，母親永遠都是他們心裡最柔軟的一塊.....

第三章 平視東南亞：解開歧視的枷鎖 23

在部分台灣人的想象中，東南亞就是落後且貧窮的地區；但對新二代而言，外婆家則是百貨公司林立、充滿特色美食的地方。新二代皆希望，台灣人能站在對等的角度，尊重並了解東南亞.....

第四章 不該承受之重 35

「就算拿到身分證，我也不被看作台灣人。」這是一位新移民媽媽的告白。對比嫁來台灣前所懷抱的夢想，成為台灣媳婦後，不只要面對社會異樣眼光，更必須在自我與家庭間作出平衡.....



第五章 撕下新二代的負面標籤..... 45

十幾年前的新聞標題「外籍媽媽遲緩兒」，讓新二代背負了問題學生的標籤。但學校老師、專家學者皆紛紛站出來說：「新二代沒有比較差。」如今，該是新二代撕下負面標籤的時候了.....

第六章 拾起媽媽的文化..... 57

不論是學習東南亞的語言、歷史、料理；或是站在推廣的角度，為媽媽的文化發聲，這些都是新二代們正在努力的方向。他們開始反思身份、尋找自我認同，希望找回屬於媽媽的文化.....

第七章 南向列車啟動後..... 69

當南向列車啟動後，新二代彷彿成為眾所期待的南向尖兵，但他們更希望將機會留給所有人。隨著東南亞熱潮崛起，新二代更希望台灣人在經濟層面外，能對東南亞的文化、宗教有更多認識和尊重.....

第八章 我們不一樣 我們也一樣..... 82

從搖籃到社會，這群新二代經歷了遲緩兒、社會問題、素質差等負面標籤，走向他們認為越來越好的現在。除了翻轉新二代的負面標籤外，更多新二代所盼望的是，成為不一樣，但也一樣的台灣人.....

〈報導企劃〉



| | |
|---------------------------|------------|
| 第一章 報導動機 | 93 |
| 第一節、台灣的新移民與新二代..... | 93 |
| 第二節、新二代仍遭污名化..... | 94 |
| 第三節、書寫新移民二代破除污名..... | 98 |
| 第四節、預期報導方向..... | 102 |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105 |
| 第一節、種族主義下的新移民配偶..... | 105 |
| 第二節、新二代的媽媽=「社會問題」?..... | 107 |
| 第三節、從新移民配偶到新二代的壓迫與歧視..... | 110 |
| 第三章 報導規劃 | 115 |
| 第一節、章節規劃..... | 115 |
| 第二節、報導對象..... | 120 |
| 第三節、採訪名單..... | 120 |
| 參考文獻 | 123 |





〈深度報導〉



第一章 新台灣之子難忘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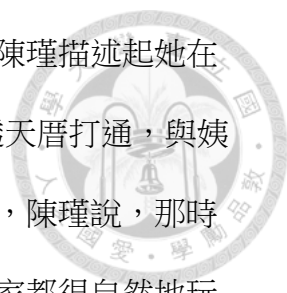
「阿瑾髒髒，我阿嬤叫我不要跟你玩！」

年幼的陳瑾獨自在鄰居家門口徘徊。她或坐、或站，一個人在門口打發時間，等著被阿嬤叫進去屋內的玩伴再出來跟她玩。玩伴轉述她阿嬤的話，陳瑾聽到後乖乖地回家了。年幼的他們，不知道自己傷了人，也不知道自己被傷害了。

不一樣的童年

「我以為我們都一樣。」陳瑾說。小時候的陳瑾認為，地球的陸地是連在一起的地球村。所以在她的世界裡，菲律賓與台灣是同一塊大陸，她在菲律賓達沃市（Davao City）的家，自然也與在台灣南投的家相連。她不懂，為什麼回到台灣一切都不一樣了。

達沃市（Davao City）位於菲律賓的最南端，是菲律賓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不僅是民答那峨島（Mindanao）經濟與行政的重心，也因為它的氣候四季如夏，同時擁有雪白沙灘的海岸線和數座活火山，擁有「南海樂園」的稱號。而「南海樂園」，就是陳瑾四歲以前的家。



陳瑾的媽媽是菲律賓人，陳瑾四歲以前都在菲律賓生活。陳瑾描述起她在達沃市（Davao City）的家，街景類似台灣的二線城市。兩棟透天厝打通，與姨媽一家人比鄰而居，偶爾還會翻牆與鄰居玩。回想起那段時間，陳瑾說，那時候真的很開心，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也沒有國族的概念，大家都很自然地玩在一起，「沒有人覺得我不一樣，」陳瑾說。

「一聽到別人叫我『番仔瑾』，我就很想回菲律賓。」陳瑾說，「番仔瑾」是台灣鄰居給陳瑾取的綽號。當她四歲回到台灣生活後，就常常因為膚色深而引起鄰居的嘲笑。她接著說，當她五、六歲比較能夠理解中文和台語的意思時，才發現原來台灣人沒有很喜歡菲律賓。

因為四歲前太常在台灣與菲律賓間移動，那時天真的陳瑾以為跟以前一樣，過不久就可以回菲律賓的家，所以當時的她並沒有意識到，四歲那次搭機回台，原來是要在台灣定居。而「番仔瑾」就像一個開關，開啟他對於菲律賓的思念，她也是到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我不能再回菲律賓了。」

新二代而非混血兒

像陳瑾這樣媽媽為菲律賓人、爸爸為台灣人的孩子，被稱之為「新移民二代」，更早之前被稱作「新台灣之子」。根據內政部定義，新移民子女是指「子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內政部定義中，新移民雖被廣義視為「非居住臺灣地

區」並設有戶籍的國民；但不論是在報章媒體或是學術研究當中，新移民子女的定義，往往限縮為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配偶，與台灣人所生之小孩。其他國家，如：歐美、日韓等國家配偶所生之子女，則常被稱為「混血兒」，而非新二代。

然而，小小年紀的新二代並不了解，「新二代/混血兒」稱呼背後的差異，可能隱含文化高低的歧視，或是身份上的區分。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份不同，媽媽的身份也不同。因此，當他們第一次遇見赤裸裸的惡意和歧視時，總讓他們難以消化和承受，甚至轉而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事情，才讓別人不喜歡他們。

張辰嘉第一次遭遇到的歧視，就像一團巨大的黑影，常會忽然向他襲來。一股黑暗的窒息感包圍他、籠罩他，使他無法求助也無法脫逃。回憶起最初的場景，他仍可以感覺到那股窒息感。

張辰嘉有著一雙大眼睛和深邃輪廓，從他臉上可以想像媽媽的樣子。他笑說，連泰國人都會誤認他是當地人。「我從小就很早熟，可能是認知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吧！」他說。他的媽媽是泰國華僑後代，雖然沒有特別跟別人說，但他生活的雲林水林鄉，是一個純樸的農村小鎮，家庭事務很容易成為鄰里間的談論話題。所以，張辰嘉媽媽是泰國人的事情，鄰居、同學幾乎都知道。

「我從國小到國中，人緣一直都不好。」張辰嘉淡淡地說。讓他無法釋懷的，是同學拿他的身份開玩笑，並嘲笑他是「泰國人妖」。自從那次被國小同學

取笑後，他說，他再也無法敞開心胸，跟別人交朋友。那句「泰國人妖」成為他難以抹滅的傷口，是他心中最大的陰影。



談起小時候被欺負的回憶，張辰嘉的爸爸曾經告訴他：「如果你被欺負，記得要欺負回去。」他說，他小時候很愛哭，雖然試著照爸爸的話跟別人打架，但不一定會打贏。就算打贏了，在班上的處境也不會比較好，他仍舊是遭排擠的邊緣人物。

至從發生排擠事件後，張辰嘉的座位被老師換到靠窗邊的角落。他不懂，「明明被霸凌的人是他，為什麼是他要被隔離？」從此以後，他也將自己與外界隔離，不再相信任何人。

問到當被欺負時會不會向父母或是師長求助，張辰嘉回答：「我都自己憋在心裡。」他生氣又無力地說，老師會覺得班上十幾人欺負他一個人，所以把他一個人隔離，就不會有霸凌事件的發生。他當時的惶恐並沒有獲得老師的理解，反而更加被標籤為「邊緣人物」。因此，他決定要自立自強，成為防衛心強又早熟的孩子。

外婆家的避風港

不同於台灣所帶給他的負面回憶，從媽媽身上，泰國帶給張辰嘉許多美好的回憶，甚至成為他心中的避風港。對比雲林水林鄉的家，他的外婆家位於泰國

的首都曼谷，是個車水馬龍、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在國小、國中階段，他幾乎每個暑假都會回外婆家住上一、兩個月。他笑說，不知道為什麼，回到泰國，連媽媽做的糯米小丸子、芒果糯米都變得更好吃了。



回外婆家，是張辰嘉每到暑假時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也是他唯一可以暫時離開台灣生活圈的機會。他說：「我們家連過年都不會買新衣服，只有回泰國前才會特別治裝。」他知道買新衣服，是為了讓外公外婆知道，他們在台灣過得很好。

他如數家珍地指著照片，介紹起他在泰國的親戚，雖然不常見面，但對張辰嘉而言，有關泰國的人事物，都令他感受熟悉和安心。提起泰國的一切，才讓原本嚴肅、口氣平淡的他，變得輕鬆且展開笑顏。彷彿暫時放下在台灣的武裝，因為他知道，在泰國，沒有人會歧視他。

「我一直很想回泰國生活，那裡讓我有歸屬感。」他說。張辰嘉嚮往泰國，不是因為它的光鮮亮麗，而是它是混亂感。「這種曖昧不清比太理性的東西好多了，」不論是灰暗的巷弄、隨處可見的小攤販，雖然泰國的一切，並不是那麼井然有序，卻有一種專屬泰國的街頭混亂感。這樣的混亂感反而讓張辰嘉感到親近和熟悉，讓他聯想到許多不容於主流社會的次文化或是少數族群，或許就像國小時期的感受一樣，他也是不容於社會的一群。

隱藏的媽媽

校園往往是新二代遭遇偏見與歧視的最初場域，那也是他們初次開始適應團體生活，並學習融入社會的時刻。當他們離開家庭，走出原本的舒適圈，才發現自己原來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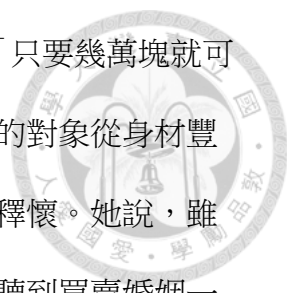
五、六年級的教室裡，老師在講台上詢問班上是否有人的媽媽是外籍配偶，可以到學校接受中文的輔導教學。如同三、四年級做過的調查一樣，徐樺姿正要舉起手來，卻看見三、四年級時跟她一起舉手的同學，坐在座位上一動也不動。她心一慌，放下微微舉起的右手，以沈默作為該問題的回答。

從那時起，她才明白，媽媽的身份好像是不可以說的。「因為同學會排斥我媽媽的國家。」她無奈地說。

徐樺姿的媽媽來自印尼，與她的爸爸經由相親認識，也是一般所認知的仲介婚姻。她提起，當時在學校，還有部分新二代，都做出跟她一樣沈默的決定。因為她們了解，自己媽媽的身份在台灣是不受歡迎的。

新二代對於媽媽的沈默其來有自，除了直接的嘲笑和攻擊外，隱性的歧視以及加諸在新移民身上的刻板印象，更讓新二代們感到害怕，深怕自己也陷入同樣的困境。因此，除了沈默外，甚至選擇隱藏媽媽。

第一次見識到關於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徐樺姿仍記得當初如同被針刺的感受，而手執針筒的人，竟是平常一起玩鬧的同班同學。教室裡，原本大家都在嘲笑一個身材胖胖的同學，笑他以後會娶不到老婆。徐樺姿心想，又是一群無



聊男生的對話，她沒有參與，也不以為意。直到有同學說出：「只要幾萬塊就可以去東南亞買一個了。」當下，那根針瞬間刺傷徐樺姿，歧視的對象從身材豐滿者，轉到新移民配偶上。這句話讓她非常受傷，至今都難以釋懷。她說，雖然自己也清楚爸媽的婚姻的確是透過仲介介紹，但從別人口中聽到買賣婚姻一事，還是覺得很不舒服。

從那件事情後，來自印尼的媽媽，成為徐樺姿說不出口的秘密。她選擇在話題中輕描淡寫地帶過關於媽媽的話題；若非得談到媽媽，就隱藏她來自印尼的身份。她內疚地說：「我一直不敢讓媽媽知道，當時我是排斥她的身份的。」

雖然她心裡很愛媽媽，但害怕因印尼而帶來的歧視，仍舊抗拒媽媽的身份。所以國中時期，每當同學問起爸媽是哪裡人，她總是回答：「我爸媽都是桃園人。」也將爸媽的認識經過改為「因為同學關係而相愛結婚」。印尼媽媽的角色，就能完全消失在同學對她的認知當中。

徐樺姿回想起高中時，有一次在家跟同學講電話，當時媽媽也正好跟印尼同鄉聊天，她因為害怕同學聽到媽媽在講印尼話，就趕快轉移話題讓同學分心。沒想到同學竟然問：「你媽媽講的話，我怎麼聽不懂啊？」還好最後在她的四兩撥千斤下，同學沒有起疑，才讓她放心來。

徐樺姿記得那時的她，始終害怕會露出一點破綻，讓大家發現她媽媽不一樣的身份。因為那也代表，她將成為「買來的女兒」。



華僑就一樣？

不同於徐樺姿對於媽媽身份的排斥，出生於印尼的新二代張鈺惠，則從不避諱談到印尼和她的媽媽。對她而言，關於印尼的回憶，是她童年很重要的一部分。

張鈺惠的媽媽是印尼華僑，在他們的家族裡，印尼華僑跟印尼當地人（他們稱為「土人」）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張鈺惠的媽媽從小就非常強調他們家的華人血統，甚至自己的國族認知也是中國人，還會刻意區別出華僑與印尼當地人的不同。

六歲以前的張鈺惠，有一半的時間都住在印尼。因為媽媽娘家是經商的關係，媽媽必須幫忙照顧家裡的生意，所以無法全職照顧她。因此，大多時間都是由家中的印尼幫傭帶大，她也就跟著幫傭學起印尼語。張鈺惠笑說：「我從小就習慣多聲道溝通。」不論是中文、福建話、客家話、印尼話小時候的她都可以轉換自如。

張鈺惠的外婆家位於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的棉蘭市，而他們的家族生意則是開設大型雜貨店，從食品、衣物、生活用品都有賣，供應棉蘭居民的生活所需。她形容印尼的家族生意是一間兩層樓的「神秘雜貨店」，她笑說：「從LV到礦泉水都有賣。」無疑是一間小型的百貨公司。她說，棉蘭雖然不是太先進的城市，但因為盛產石油、天然氣，所以當地石油公司人員的消費水平還不錯，高

級精品也是專賣給那些石油公司的貴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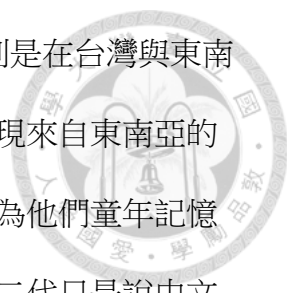


「我中文講得很好，不管什麼語言的發音都可以很道地，所以我不會被歧視。」張鈺惠說。六歲以後，她就沒有那麼頻繁的回去印尼，在父母的選擇下，她一路在台灣求學成長。回到台灣後，自幼稚園大班開始，張鈺惠就被媽媽送去補習班，不是補台灣學生常見的心算、畫畫、兒童美語，而是「補中文」。她解釋，媽媽雖然是華僑，但是說起中文還是有不一樣的腔調。

張鈺惠從小就知道自己擁有台灣、印尼兩種國籍的身份，可能因為小時候在兩個國家都生活過的關係，她表示，新二代身份對她來說是很平常的事情，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的社會風氣會讓新二代變得很不平常，她疑惑說：「我們都是台灣人，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媽媽是印尼華僑，長相跟台灣人沒有太大不同，只是口音不一樣。」張鈺惠說。因為媽媽的華僑身份，讓她在回台灣後，沒有太大的融入問題。她說，同學知道他媽媽的身份只是驚訝，沒有排擠或是歧視的行為，但她還是不會刻意讓同學知道媽媽印尼人的身份。她提到，當別人問她膚色深的原因，她就會解釋說：「我媽媽是印尼『華僑』。」在某些時刻，華僑彷彿成為一張擋箭牌，可以為她和媽媽擋下異樣的眼光和偏見。

背起包袱向前行



回顧新二代的童年經歷，有些人從小就在台灣長大；有些則是在台灣與東南亞之間飛來飛去。相同的是，他們都可以從幽微的細節中，發現來自東南亞的不一樣好像不太好。不論是外表、口音或是他們的媽媽，都成為他們童年記憶中，最容易被標示出不一樣的地方。如同張鈺惠所言，有些新二代只是說中文時有媽媽的口音，不代表中文不好。她說：「難道有口音的中文就不是中文嗎？為什麼要因此被否定？」

如同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情形一樣。歐巴馬的父親是肯亞的盧歐族人，母親是生於美國堪薩斯州的白種人。黑白混血的他，卻總被放大他非裔的身份。台灣新二代在面對歧視和誤解時，往往也會在心裡疑惑：「我不也是台灣人嗎？為什麼一直要說我不一樣？」

雖然也有幸運的新二代不曾遭遇歧視，卻還是有些孩子，必須一路揹負因母親身份而帶來的承重包袱。不論是「泰國人妖」、「番仔」或是「買來的媽媽」，都是他們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阻礙。

慶幸的是，長大後的新二代，開始正視自己的身份，也讓他們有信心展開尋根之旅。隨著他們年齡漸長，台灣也愈來愈多人關心新二代的處境，很多問題終得以浮上檯面討論。回想一路成長的心路歷程，新二代的童年記憶，也是台灣社會的反射鏡。



第二章 我的媽媽不一樣

「如果你不是越南人就好了！」

那是潘琳燕在國中以前，每次跟媽媽吵架時，都會講的話。

「以前跟媽媽吵架的時候，都會刻意拿她的國籍來攻擊她。」潘琳燕說。雖然現在的她在提起這件事時，講得雲淡風輕，像一件普通的陳年往事。但她的臉上，始終帶著愧疚的微笑，嘴裡還喃喃唸著：「以前我實在是太壞了。」

隱藏是保護媽媽和自己

潘琳燕的媽媽來自越南，在仲介的安排下相親，隨後嫁來台灣，在埔里生活一轉眼已經超過 20 年。潘琳燕從小居住的家，是她爸爸結婚前買下，位於南投埔里的公寓四樓。她說，家裡空間不大，與爸媽和妹妹同住，一家四口就這樣生活在小小的公寓裡。「因為當時的爸爸以為，他這輩子都是一個人住。」潘琳燕說。

潘琳燕的爸爸在半百的年紀，隨著相親團飛到越南，娶了當時年屆 40 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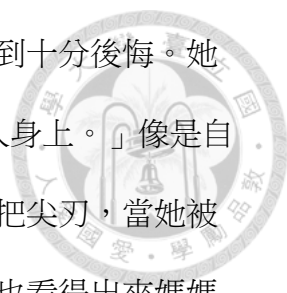
妻子。隔年，潘琳燕的媽媽以高齡產婦的年紀生下了她。嫁來台灣這 20 年當中，潘琳燕說，媽媽一直在工作，無論是到幼稚園打掃或是幫忙家裡務農，她也要負擔家裡的經濟。



提到媽媽，潘琳燕的語氣帶著不捨與愛護，不只辛苦的養家，還要分擔越南的家計。她說，自己從小就跟媽媽的感情比較好，因為爸爸常常講她聽不懂的台語或是腔調很重的台灣國語，所以她反而較少跟爸爸講話。而她眼中的媽媽，心思細膩、對人慷慨且個性堅強。雖然她深知自己愛著媽媽，但年幼時的她也一度想要隱藏媽媽的身份。

潘琳燕說，國小的時候很討厭別人談到媽媽的國籍，因為他們總是問說：「你媽媽是不是用錢買回來的？」甚至有一次跟媽媽在書局巧遇同學，媽媽很熱情跟同學打招呼，同學卻馬上用不禮貌的口氣問說：「你媽媽來自哪裡？是越南人嗎？」媽媽當下卻笑笑回應，讓她既生氣又不捨。之後同學使用很戲謔的口吻，學他媽媽講話的口音，漸漸地，她開始害怕媽媽的口音被聽出來，甚至躲避有關於媽媽的任何話題。

她舉例，每次買東西要報會員號碼的時候，她媽媽講的「761」到了別人耳中總會變成「701」。在她聽來媽媽講得很標準，卻總是被別人誤聽，讓她跟媽媽都很氣餒。於是，她會有意無意打斷媽媽跟別人講話，或是搶著幫媽媽說話。對她而言，那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媽媽的一種方式。她心疼地說：「就算別人笑媽媽的口音，媽媽也不會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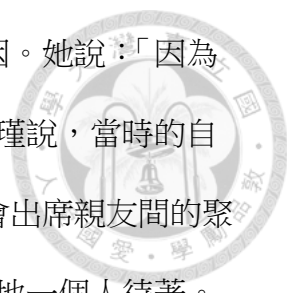


一想到自己曾經隱藏媽媽，覺得她口音很丟臉，潘琳燕感到十分後悔。她懊悔地說：「小時候常常把不順心的原因，怪罪到媽媽是越南人身上。」像是自己功課不好、被同學嘲笑等等。對她而言，媽媽的國籍就像一把尖刃，當她被這把尖刃給刺傷的時候，她就會用這把尖刃去傷害媽媽。但她也看得出來媽媽其實很難過，只是都沒有說出口。

想要保護媽媽

當新二代因為身份受到歧視時，有些人第一時間會怪罪媽媽或是隱藏媽媽，但在他們心中，媽媽永遠是他們最想保護的對象。因此，很多時候路人、鄰居甚至是家人對於媽媽的偏見與歧視，新二代也都看在眼裡，心中卻心疼又氣憤。

面對外界的異樣眼光，媽媽為泰國籍的新二代陳瑾說，爸爸因為好面子，面對親友間的閒言閒語時，也會覺得自己老婆讓他丟臉，從來沒有為媽媽說過一句話。陳瑾的媽媽在她四歲時離家，中間有三、四年間失去了聯繫，直到國小後才與媽媽重新團聚。她說：「原本媽媽滿心期待想要回來，後來卻很排斥與其他人相處。」她提到，從小自己就能感受到親戚間對於媽媽的不友善態度，她常常因為媽媽被欺負而氣到哭。她舉例，媽媽一開始都會出席親友間的聚會，後來逐漸感受到親友們不友善的態度，便從此不再參加家庭聚會，寧願一個人關在家。



陳瑾提到，直到她國中時，媽媽才說出不去參加聚會的原因。她說：「因為媽媽覺得大家都會笑她，也不喜歡她。」回想起那段時光，陳瑾說，當時的自己「心裡跟媽媽一樣帶有自卑」，雖然因為長輩的壓力，仍舊會出席親友間的聚會，卻也擔心自己也會被嘲笑。所以多數時候，寧願安安靜靜地一個人待著。直到升上高中，因為課業繁忙的因素，可以不用再出席那些聚會。陳瑾說：「那讓我跟媽媽都輕鬆很多。」

同樣感受到外界對媽媽不友善的，還有潘琳燕，她認為：「親戚、鄰居間的閒話，會影響爸爸對於媽媽的態度。」她提到，原本爸媽都有各自的工作。爸爸是種植茭白筍的農夫，媽媽則自行在外面工作，收入也是各自管理。但鄰居卻跟爸爸說：「如果錢放在老婆那邊，她就會跑掉。」在那之後，媽媽幫忙爸爸務農，爸爸卻不給她媽媽任何收入。她認為爸爸很自私，從來不會為她的媽媽著想。她說：「媽媽沒有收入，就很難回越南了。」

回娘家對於許多新移民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多數新移民都如同潘琳燕的媽媽一樣，由自己的收入、夫家態度，來決定她們可以回娘家的次數。對新移民來說，「回家」這件事情不只要克服距離上的問題，像是經濟問題、夫家眼光等，更是讓他們的回家之路更加遙遠。

提到媽媽第一次開口想要回娘家的場景，媽媽為印尼籍的新二代徐政民說：「媽媽一直拜託阿公，但阿公還是不讓她回印尼。」他記得，當時媽媽跟阿公在樓下吵得好大聲。他雖然記不清楚在講什麼，但他永遠記得，媽媽那天把自己反鎖在房間，哭得好傷心。他提到，當時印尼的外婆生病，媽媽很著急，

想要回印尼去探望外婆。由於媽媽那時候還沒有工作，身上並無積蓄，爸爸也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機票，只能跟阿公借錢。「但阿公拒絕了。」最後，是由徐政民的姑姑借錢給他媽媽，讓他媽媽帶著年幼的弟弟一起回印尼，見外婆最後一面。他說：「那是嫁來台灣後，我媽媽第一次回印尼。」

我的超人媽媽

當媽媽遭受到不友善對待時，當時小小年紀的新二代，或許無法第一時間站出來為媽媽發聲。但一想到媽媽曾經經歷過這些，縱然已事隔多年，仍聽得出新二代語氣中的憤怒和心疼。因為不論媽媽來自哪裡、不論外人如何評價媽媽，對他們而言，母親都是他們生命中最親密、最驕傲的家人。

像是越南新二代黃惠美總是大方承認媽媽的越南國籍，她說，哥哥在老師調查誰的爸媽是外國人時，舉手回答媽媽是「日本人」。頓時，班上同學開始羨慕起她哥哥的身份，反觀，媽媽是「越南人」的黃惠美，她說：「從來沒有人羨慕過我。」

雖然不被人羨慕，但黃惠美從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始終為媽媽而感到驕傲。提起她心目中的媽媽，她驕傲地說：「我的媽媽是超人。」

黃惠美細數著媽媽的偉大，她的話語中洋溢著對媽媽的敬愛和崇拜，一一列舉出「超人媽媽」的全能之處。除了工作、做家事、照顧小孩外，她媽媽每個月還要寄錢回越南老家，等於一個人肩負起兩個家庭的經濟責任。她提到，

媽媽在越南的工作類似服裝設計師，小時候媽媽常常做衣服給他們穿。剛嫁來台灣後先到工廠當女工，現在則在賣越南料理，無一不會的媽媽是她心目中「十項全能」的神力女超人。



然而，這樣的超人媽媽也曾經被同學取笑。黃惠美說，她媽媽曾經因為中文口音奇怪，而被幼稚園同學問說：「你媽媽是傭人嗎？」當下她很生氣，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心目中的超人媽媽，一夕間卻成了同學眼中的傭人。她為媽媽打抱不平地說：「那麼好的媽媽，為什麼要被說成傭人？」

但她媽媽反而安慰她說：「要做得比台灣人好。」這也成為她成長的動力。在媽媽的支持下，她即將前往菲律賓就讀語言學校，希望將英文學好，不辜負媽媽對她的期待。

除了英文之外，黃惠美從小就被媽媽訓練，一個人回到越南外婆家生活。每到寒暑假期間，她就會被媽媽「丟」回越南，一待就是一個月。她已經獨立回去十幾次，從剛開始一句越南話都不會說，到現在已經可以對答如流。她記得，前幾年，因為不適應環境、加上語言不通的關係，每次回去都在哭。有一年，哭著打電話給媽媽訴苦，結果媽媽立刻買機票從台灣飛來接她回家。

但她笑說，隔年還是得回去，因為學越南文是媽媽很堅持的事情。

黃惠美從沒因為害怕被歧視而放棄學越南語，因為那是媽媽的語言，也是媽媽最希望她學好的事情。縱使媽媽每天辛苦工作，仍舊堅持讓她每年回越南，

甚至出國學英文。看在黃惠美眼中，媽媽就是這樣如超人般的存在。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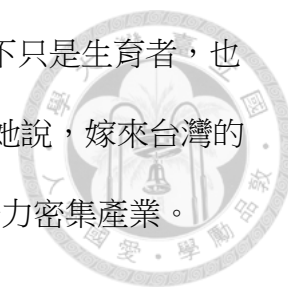
如潘琳燕和黃惠美的媽媽，許多新移民都是懷著理想嫁來台灣，有些人背負著原生家庭的期待，成為改善娘家經濟的支柱；有些人則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來台灣追尋更好的生活。但到台灣後，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常常讓她們措手不及，不只要扮演好媽媽、妻子、媳婦的角色，有時候更要與丈夫共同負擔家計。對她們而言，嫁來台灣的生活反而充滿更多的挑戰。不論是家裡的廚房、收割的農田或是街邊的小吃店，都可以看見她們工作的身影。

而新移民辛勤工作的身影也看在新二代眼中。在他們心中，媽媽總是承受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不只要負擔台灣的家計，娘家的經濟壓力也是她們肩膀上的重擔之一。

在飄洋來台之前，新移民配偶心中都有一份對於台灣的美好憧憬，嚮往台灣是個閃亮的自由島國。但不同於童話世界中，公主嫁給王子般的美好，不論是傳宗接代或是經濟上的壓力，都迫使嫁來台灣的她們要共同肩負起現實的重量。

尤其，多數新二代的媽媽在嫁來台灣一年左右，就會懷孕生子，但同時又要投入職場工作分擔家計，成為台灣人口和經濟結構的支柱之一。台東移民署

官員同時也是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表示：「新移民不只是生育者，也是生產者。」以她在台東移民署服務超過 10 年的經驗而言，她說，嫁來台灣的新移民配偶幾乎都在工作，並且多數從事台灣人不願意做的勞力密集產業。



我的媽媽在哪裡

如同多數新移民配偶來台所從事的勞力密集工作，陳瑾的媽媽嫁來台灣後也在南投的燙衣場裡上班。陳瑾說，四歲以前他跟爸媽過著台灣、菲律賓兩邊飛的生活，她媽媽在菲律賓是駐唱歌手，但只要媽媽在台灣的燙衣廠有工作，他們就會待久一點才回菲律賓。

陳瑾四歲那年，媽媽獨自回菲律賓奔喪。然而，回到菲律賓後，媽媽突然音訊全無，像是消失了一般。其後的三、四年間，她跟爸爸完全沒有接到媽媽的任何消息。

「我連我媽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陳瑾說。

聯絡不上媽媽的期間，陳瑾的爸爸代母職，獨力照顧她，父女間的感情相當親密，但陳瑾說，她偶爾也有很想媽媽的時候。

「想媽媽的時候，我就去聽木匠兄妹的歌，因為媽媽的聲音跟主唱很像。」陳瑾說。聲音一直是她懷念媽媽時，慰藉思念的良方，她也會拿出小時候牙牙學語時的錄影帶來看，因為那是她媽媽錄的，裡面有著媽媽的聲音，以

及與媽媽互動的身影。




陳瑾跟爸爸的感情雖然親密，但那時才上幼稚園年紀的她，必須獨自承受對於媽媽的思念，又無法與爸爸傾訴想念媽媽的心。「因為我一哭，爸爸就會叫我閉嘴。」陳瑾說。小小年紀的她總是用盡她的方式去想念媽媽，除了聲音外，她也會想看看媽媽。

陳瑾爸爸的書桌是一張墊著厚厚玻璃桌墊的木頭桌子，桌墊下壓有一張小時候媽媽抱著她的照片，因此，想媽媽的時候，幼年時的陳瑾會獨自走近爸爸的書桌，用短短的手指攀著桌緣，使勁地墊起腳尖，趴在桌上看著那張照片，一個人安靜的思念媽媽，因為只有這時候可以哭，不會被爸爸看到。

在陳瑾七、八歲的時候，媽媽又忽然回到她的生命裡，就像媽媽忽然消失的那天一樣，一切都是毫無預警。那天，陳瑾的爸爸來安親班接她回家，突然一通電話打來，電話那端是一個陌生卻又熟悉的聲音，陳瑾對著電話那端大喊：「媽媽！」

陳瑾的媽媽回來了。沒有任何轟轟烈烈或是戲劇化的過程，在那通電話後，媽媽又回到他們身邊了。

不一樣的媽媽



事過境遷後，回想起聯絡不上媽媽的期間，陳瑾平靜地說：「我不會怪媽媽的缺席。」後來她從媽媽那裡得知，原來媽媽消失的三、四年期間，一直在台灣工作，只是到台北幫傭時無法聯絡上他們。媽媽告訴她說，那幾年間，她曾試著打電話回南投老家，但親戚卻裝傻說不知道她是誰，感覺想要隔離她與陳瑾。

然而，在與媽媽重新聯繫上後，陳瑾與媽媽依舊不能常常見面，因為媽媽換到基隆去幫傭，只有假日才能回南投團聚。陳瑾說：「我已經很習慣媽媽不在身邊了，所以不會吵著一定要跟媽媽同住。」

陳瑾三年級時，媽媽辭掉了基隆幫傭的工作，回到南投竹山的燙衣廠工作。但自從媽媽回到身邊後，她開始感覺到自己媽媽跟別人好像不一樣。她提到，因為菲律賓的廁所馬桶沒有馬桶蓋，一般菲律賓人都是蹲在馬桶上上厕所，所以她媽媽在台灣也是這樣，讓她覺得很奇怪。她說：「媽媽皮膚黝黑、講話又特別大聲，感覺不太像台灣人。」

媽媽的「不一樣」，讓陳瑾曾經想把媽媽隱藏起來。她提到，國小時，有一次跟媽媽在書局門口巧遇同學，同學就問說：「那誰啊？你阿姨喔？怎麼那麼黑！」她被嚇到就脫口而出：「對！那是我阿姨。」

陳瑾解釋，當下內心的感覺很複雜，很自責自己怎麼可以這樣講媽媽，但也覺得自己是因為媽媽的身份才被同學取笑，心情真的很複雜。那時候的她，因為同學、親戚、鄰居的關係，也開始嫌棄媽媽、排斥媽媽，甚至連爸爸也會因

為好面子，覺得老婆讓自己好丟臉。



以媽媽為傲的新二代

雖然現在講起來十分坦然，但提到當時自己對媽媽的心態，陳瑾仍非常後悔。陳瑾說自己進了大學，念了東南亞系後，才逐漸改變想法；甚至覺得自己的身份很特別，成為她與眾不同的優勢。

來到台中第一廣場附近，穿過各式各樣的東南亞店家，最後來到一間由新移民配偶所開設的咖啡廳。陳瑾說，她當天晚上將在這裡參與非營利組織舉辦的活動，主皆是關心移民與移工。現在的她，談起自己身份不但不再隱藏，並且關心和媽媽一樣來自東南亞的移民、移工。

在她 16 歲時，媽媽提出要去瑞士幫傭，因為媽媽的姐姐也在那邊工作，薪水待遇比台灣好很多。「我希望妳能過好一點的生活。」是陳瑾的媽媽去瑞士工作前跟她所說的話。所以，陳瑾與媽媽現在仍分隔兩地，她則常常使用網路通訊跟媽媽連絡。即使至今已經三年多沒跟媽媽見面，但為了讓媽媽有更好的工作環境，不用再去燙衣廠、洗衣廠、殺雞場做一些辛苦的高勞力工作，陳瑾願意暫時與媽媽分離。

每當提到媽媽，新二代的語氣總是變得溫柔卻堅定，因為媽媽是他們最不捨、但也最驕傲的家人。他們眼中的媽媽不但要工作養家，還得承受社會異樣

的眼光。從前，他們或許曾有想要隱藏媽媽的念頭；現在的他們不但為媽媽驕傲，甚至會挺身而出，為媽媽、為所有新移民發聲。希望那些曾經發生在媽媽身上的歧視，可以永遠消失。



第三章 平視東南亞：解開歧視的枷鎖



「誒！你昨天晚上吃什麼？」

「你確定你要聽嗎？我先提示，是一種越南食物。」

「什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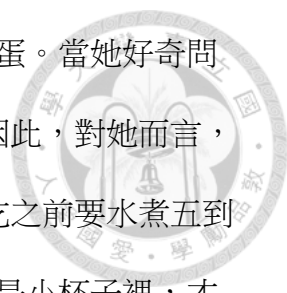
「你真的確定你要聽嗎？我怕你聽了會害怕。」

「是鴨仔蛋。」

你的噁心 我的美食

以上對話是曾郁晴每次碰到「鴨仔蛋」話題時的應對方式。曾郁晴說：「我覺得鴨仔蛋很好吃，但台灣人好像都不喜歡。」

鴨仔蛋是東南亞常見的食物，由於價格便宜，又有營養價值，受歡迎程度就像台灣的茶葉蛋一樣普及。小至街邊小店，大至餐廳飯店，是所有餐廳都會賣的一道國民小吃。鴨仔蛋的外表跟一般鴨蛋一樣，不同的是，鴨仔蛋選自受精 15-18 天、快要孵化成形的鴨蛋，用水煮過後，可沾取鹽巴、胡椒等香料一起食用。但由於是取自快孵化成形的受精鴨蛋，所以在吃的時候，小鴨的臍帶、骨骼甚至是羽毛都清晰可見。



曾郁晴笑說，小時候回越南，媽媽都會餵她跟弟弟吃鴨仔蛋。當她好奇問媽媽「這是什麼」的時候，媽媽總是回答她：「這是雞蛋。」因此，對她而言，鴨仔蛋就是一種很普通、很常吃，也很喜歡吃的越南食物。「吃之前要水煮五到七分鐘，因為裡面有湯汁，所以吃的時候，要放在一個小碗或是小杯子裡，才不會漏掉最好喝的精華。」曾郁晴熱烈地解釋如何最道地得吃鴨仔蛋。而越南新二代潘琳燕也說：「吃的時候，不可以直接把蛋殼剝開，要先在蛋殼上剝出一個小洞，一飲而盡裡面鮮美的湯汁後，才會開始吃蛋。」對於她們兩人而言，鴨仔蛋是一種再平凡、再美味不過的越南美食了。

曾郁晴、潘琳燕口中的國民美食「鴨仔蛋」，卻被美國《富比世》雜誌評選為「全球十大噁心食物」。可想而知，鴨仔蛋在東南亞以外的地方，接受度並不高。在台灣，大部分民眾對於鴨仔蛋的印象來源，不是外景節目獵奇般的介紹，就是遊戲節目輸家的懲罰，因此，台灣人對於鴨仔蛋總是抱有一種「噁心」、「可怕」的畏懼心態。曾郁晴提到，有一次看到美食節目主持人到越南出外景，結果竟然邊哭邊吃鴨仔蛋，她無奈地說：「有這麼可怕嗎？」

不論是節目效果，或是因不了解而帶來的恐懼，曾郁晴說：「不敢在大家面前提鴨仔蛋了，怕大家覺得很噁心。」

自以為是的歧視

如同台灣人因不了解，而對鴨仔蛋所產生的偏見和誤解；對於新移民或是

新二代而言，在他們身上也看見了許多無知的標籤。



在國中補習班的教室裡，生物老師正教到遺傳學的概念，他隨口問了一句：「有沒有人的爸媽是外國人？」因為補習班都是從國小一起補習到國中的同學，黃惠美自然地舉起手說：「我媽媽是越南人。」語畢，坐在她座位後方的新同學，拍拍她的肩對著她說：「難怪你這麼黑，原來你媽是越南人。」頓時，班上一片寂靜，黃惠美激動又生氣的語氣劃破了凝結的空氣，她轉向那個新同學說：「我媽很白好不好！我皮膚黑是因為我愛曬太陽。」像是用盡全力反擊後的虛脫感和委屈感，她之後趴在桌上哭了一整節課。

對黃惠美來說，那是她永生難忘的一節課，該同學事後雖然有道歉，但是已對她造成難以抹滅的傷害。翻開雜誌或是打開電視，媒體中充斥著各種強調美白、防曬功效的化妝品、保養品廣告，在「一白遮三醜」的審美觀之下，很多人會追求白皙透亮的膚色，認為那就是「美」的代表。然而，當歐美人士追求「小麥膚色」時，就是「健康」、「陽光」的象徵，亞洲人的小麥膚色，則會被聯想到「勞動階級」、「沒有保養」。因此，生活在四季如夏，經濟又相對落後的東南亞人，就被視為「黑」得理所當然，與「不美」劃上等話。

「很多人常常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帶有歧視。」身為新二代的小逸說。小逸擁有白皮膚、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和佻好的身材，是台灣主流審美觀中的「正妹」。她說，常常有人誇獎她長得很漂亮，但聽到她媽媽是泰國人後，往往是一陣驚訝或是沈默，隨後拋出一句：「你長得很不像泰國人耶！」雖然被誇獎長相漂亮，但仍讓她感受到「隱性的歧視」。



除了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隱性歧視外，小逸說：「不知道網友是天生就帶有歧視，還是躲在網路留言才變本加厲。」小逸十分關心新移民與新二代議題，身為部落客的她，從未掩飾自己的新二代身份，常常會在網路上針對相關議題發表意見。她笑說，縱然有時候砲火猛烈，但她還是會不遺餘力與網友「開戰」。

她舉例，有一次，PTT 論壇上在討論關於「外籍新娘」的話題，留言中有許多針對東南亞女性歧視性、甚至攻擊性的發言，就有網友留言說：「東南亞人身材都很好，但只有頭部以下可以看，因為臉都黑黑醜醜的。」她無奈又生氣地表示，台灣人都喜歡金髮碧眼的「金絲貓」，因為她們「又貴又高級」，與她們生小孩可以「改良基因」，這就是以歐美看天下的國際觀。

來自新移民媽媽的標籤

除了對於新移民外表的刻板印象外，「買賣婚姻」也是新移民配偶常被貼上的標籤之一。大學時期，班上男生跟小逸討論到外籍新娘的話題，就很自然地說：「將來要買一個越南新娘。」得知她媽媽是泰國人後，竟然問說：「你媽媽是買回來的嗎？」她當下覺得生氣又荒謬，無法理解為何台灣人所認為的新移民配偶都是用「買」的。小逸說，她的父母是因自由戀愛而結婚，完全不是「買來的新娘」。

然而，因為父母的自由戀愛，一度讓小逸成為網友攻擊的箭靶。他們認為，小逸是否認為自由戀愛比仲介婚姻高尚，所以才在網路上強調自己父母的認識經過。提到這裡，小逸覺得非常冤枉。她認為，不論婚姻的開端為何，大家都很努力地經營婚姻生活，沒有優劣之分。

除了因父母自由戀愛而被網友大肆討論外，小逸也曾因為寫文章回應柯文哲的「外配進口說」而聲名大噪，那篇文章也被許多主流媒體轉載，引發廣大的討論。然而，也為她帶來許多困擾。

「媒體將我的文章轉載，並在未經同意之下，配上一張無關內容的自拍照。」她無奈地說。小逸表示，在主流媒體報導後的幾天內，因為那張自拍照，她收到非常多的騷擾信件，包含不雅照、告白信等各式各樣的荒謬訊息。她說，最讓她感到驚訝的是，許多人會提出自己的財力證明，甚至有兩個人直接問她「要多少聘金？」，並附上他們的年收入、財產、稅單等身家證明資料，向她表明交往甚至求婚意願，並跟她強調說：「我對新二代沒有排斥感。」小逸認為，那些男性不外乎是覺得「新二代家裡一定很窮，」如果他們有房、有車一定可以吸引到新二代，如同以金錢作為前提的另一種買賣婚姻。

「外籍新娘的標籤有落在我身上。」小逸認為。除了大刺刺要以金錢吸引她的追求信外，她也看過有人在網路討論「娶東南亞女性的好處」。她說，那些人不外乎認為新移民年輕、乖巧又會做家事，是適合結婚的對象。因此，當她在網路上分享料理教學時，就有網友認為說，新二代在新移民媽媽的教育下，一定也是乖巧又賢慧。諸如此類的偏差、歧視言論，小逸說，自從她寫了關於

新二代身份的文章後就多到不勝枚舉，一開始會生氣，但後來已經可以一笑置之。她說：「自卑的人才會急著去歧視別人。」



而同樣的困擾也發生在菲律賓新二代蔡宜汝身上。她說：「男友媽媽竟問我男友，結婚後我會不會也要拿錢回菲律賓。」隨然已事隔一段時間，但提起這件事，她仍舊相當不開心。她提到，在跟她男友第一次跟他媽媽提到自己是菲律賓混血時，男友媽媽嘆了一口氣，彷彿對她的身份有所擔心。輾轉從男友口中得知這件事後，她變得很在意男友媽媽對她的評價。自從聽到男友媽媽認為她會拿錢回菲律賓後，她覺得生氣又失望。

第一次見到蔡宜汝，是在新移民親子歌唱大賽上，舞台上的她牽著媽媽的手，母女一起演唱一首菲律賓歌曲，和一首中文歌曲-甜蜜蜜。她說，這首歌對她們母女而言意義非凡，因為那是她媽媽學會的第一首中文歌。一提到媽媽，她從原本的侃侃而談，漸漸降低語速，最後是一個小小的停頓，才微微一笑，開始聊起有關媽媽的話題。不同於談到自己時的泰然自若。

不論是第一次站上舞台唱歌的媽媽，或是平常辛苦工作的媽媽，總會牽動她的情感，一下驕傲歡喜，一下又陷入心疼與不捨的情緒中。

蔡宜汝的媽媽，如同許多嫁來台灣的新移民的女性，成為改善娘家經濟的支柱。因此，當她媽媽嫁來台灣後，除了生養孩子外，也必須投入職場工作。蔡怡汝說，她媽媽工作數十年下來，不只出錢為菲律賓的家人蓋房子，更一肩擔起撫養外甥的重擔，從無怨言。「我媽媽或許需要寄錢回去，但我不需要。」面對男友媽媽的質疑，她不滿又無奈地回答。她認為，台灣人對菲律賓，仍停留

在貧窮、治安差的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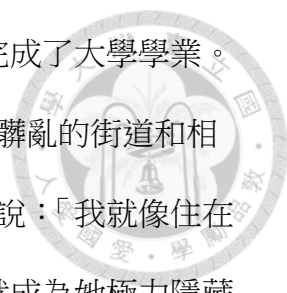
不論是要寄錢回東南亞、買賣婚姻或是必須聽話順從等，曾經出現在新移民配偶身上的標籤，一些新二代又再次承擔同樣的包袱。或許當她們談起這些事情時，已經不會動怒，甚至可以一笑置之。但從中可得知，幾十年來，刻板印象仍未完全消失。

「生」不由己

面對網路上的歧視性言論，小逸自我解嘲說，可能因為是半公眾人物，所以已經習慣了，並告訴自己不要跟無知的人計較。相較於小逸的大方自若，在部分新二代的成長經歷中，雖然沒有經歷過像小逸那種直接、赤裸裸的歧視，但受到主流言論、媒體風氣的影響，他們仍會害怕因為媽媽身份或是自己的出生地而受到異樣眼光，並預設新二代身份可能會為自己帶來的歧視。

伴隨著印尼國慶煙火起此彼落的燦爛，陳子琦出生在印尼雅加達，是名副其實的「國慶寶寶」。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為印尼華僑，在台灣相識而結婚，婚後幾年就回到印尼定居。從小生長在印尼的她，直到 18 歲時，才回到台灣就讀大學，也打算就此定居台北，不回印尼長住了。「台灣才是我的故鄉。」她說。

陳子琦從小居住在雅加達的華人社區，並就讀當地的台灣學校，回台灣唸



大學也是全家早就設定好的「待做事項」，她的姐姐也在台灣完成了大學學業。在讀大學以前，陳子琦對於印尼的認同感很低，她不喜歡印尼髒亂的街道和相對落後的環境，也不喜歡印尼人天生慵懶的做事效率。她總是說：「我就像住在印尼的外國人。」所以當她回台灣參加高中營隊時，「印尼」就成為她極力隱藏的部分。

她覺得，在台灣人眼中，印尼就是貧窮、落後又髒亂的國家。因此，當她回到台灣的時候，大家雖然不會因為她來自印尼而排擠她，但她仍會不自覺地隱藏起自己的身份。她不好意思地說：「我曾經對於生長在印尼而感到丟臉。」

對當時陳子琦而言，她心目中的印尼，是一個會讓她感到丟臉的「異鄉」；而台灣，雖然只有寒暑假才會回去小住，卻是她心中真正的故鄉。這樣的想法來自媽媽的影響，因為她媽媽就是希望她跟姊姊成為台灣人，而不是印尼人。所以就算生長在印尼，家庭所給予她的生活環境也是充滿台灣味，不論是飲食、文化認同、居住的社區或是就讀的學校，都跟印尼人大相逕庭。

直到高二時，一名地理老師的到來，才改變陳子琦對於印尼的認同。她提到，這名地理老師是從台灣過來教書的替代役，由於熱愛印尼文化，選擇到印尼的台灣學校服務。這名地理老師不只鼓勵班上的台灣學生要接觸、認識印尼文化；更身體力行，帶著全班到清真寺參觀，或是走進屬於在地印尼人的市集。

雖然陳子琦從小都在印尼生長，這些地方也隨處可見。但若不是地理老師

的帶領，她可能永遠不會踏入。她笑說：「不只是她，那也是班上很多同學的初體驗。」



在印尼，有將近九成的民眾信仰伊斯蘭教，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清真寺、禱告教堂等伊斯蘭建築，就成為印尼日常的生活景色。每到一天五次的朝拜時間，教堂的宣禮塔就會開始廣播經文，不論是家裡或是路上都可聽見宣禮塔所播送的經文。而在陳子琦學校旁，也有一座禱告教堂，她說，每到禮拜時間，教室內就可聽見遠處傳來的經文廣播。

然而，不同於穆斯林會暫停手邊所有事情，湧入附近的教堂做禮拜；在陳子琦的教室內，宣禮塔的經文彷彿成了上課時的背景音樂。他們照常聽課、照常活動，絲毫不受任何影響，跟外面的伊斯蘭世界形成對比。直到一次地理課，老師忽然停止講課，叫大家注意聽外面的經文廣播，陳子琦才第一次靜下來專心聆聽，也是她第一次用心感受伊斯蘭文化。

後來又在地理老師的帶領之下，在印尼生長十幾年的陳子琦，第一次踏入清真寺、第一次走入當地市集，甚至第一次認真聆聽禱告經文。受到地理老師的影響，她開始對伊斯蘭文化產生興趣，也驚訝自己在印尼生活這麼多年，卻一直忽略當地的文化。

現在的陳子琦，開始看見印尼的好，不再排斥自己與印尼的關係，也在大學修習印尼文，並主動介紹印尼給班上同學認識。印尼在她心中，逐漸從異鄉成為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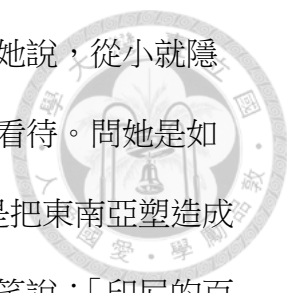
遭污名化的東南亞

回憶起之前對於身份的顧慮，陳子琦覺得似乎是自己先給印尼貼上標籤，並擔心大家也會用同樣的標籤看待她。但到台灣唸書後，才發現大家對於她的身份都很友善。「因為以前的刻板印象，才讓我『預設』自己會被歧視。」她說。

新二代對於東南亞的觀感，往往來自於媒體或是主流言論，而社會對於東南亞的評價和態度，更會影響到新二代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同，以及父母對於新二代的認知教育。陳子琦說，上大學前，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自己或是媽媽對於印尼的印象都不是很正面。一心只認同台灣，甚至急於切割跟印尼的關聯。

她媽媽曾經告訴她說：「印尼文不要學太好，以免被認為是印尼人。」但如今，隨著東南亞經濟崛起，與多元文化意識的提升，改變她們對於印尼文化的認同。她笑說：「現在如果有人講印尼壞話，我一定會生氣。」


提到台灣對於東南亞的認識，許多新二代都難免長嘆一口氣。他們認為，有些台灣人自以為站在高處，用陳舊、錯誤的刻板印象去理解東南亞文化。對此，印尼新二代劉依婷表示，「台灣人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明明別人都已經起飛，台灣人卻還停留在以前的印象裡。



劉依婷雖然沒有因為媽媽的身份而受到歧視或是排擠，但她說，從小就隱約感覺到暴露媽媽是印尼人的身份，會被大家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問她是如何感受那種不友善的氣氛，她回答：「台灣的媒體和教育，就是把東南亞塑造成一個落後的地方。」回想起在印尼逛百貨公司的經驗，劉依婷笑說：「印尼的百貨公司一天都逛不完，裡面還有運河耶！」她認為，台灣人應該要改變狹隘的心態，不要將東南亞視為矮台灣一截的落後地區，如此才能避免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歧視和誤會，改善新移民和新二代在台灣的處境。「要把台灣跟東南亞拉在同一條水平線，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姿態。」她強調。

針對台灣崇尚日韓、歐美，但對東南亞卻興趣缺缺的現象，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張正，舉了一個語言補習班當例子。他表示：「為什麼『地球村』只教美語和日語？難道地球上只有說英語和日語的人嗎？」他認為，若要讓新二代能夠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首先，必須讓他們對媽媽的母國文化有信心。他提到，當時在找新二代當移民移工文學獎的評審時，並不容易，因為多數新二代會選擇隱藏身份。

小逸也提到，很少會有新二代在網路上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她當部落客的經驗舉例，如果是歐美、日韓混血的部落客，很多都直接將部落客或是粉絲團名稱取為「台韓混血 000」或是「台法混血 000」，多數都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反之，父母為東南亞人的小孩，就不會將自己稱之為混血兒，反而被稱為「新二代」。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小逸認為，新二代身份多數時候還是一種包袱，需要更多的溝通與理解才能化解。



除了直接了當的批評和惡意的挑釁外，「隱性的歧視」和「無知的惡」更是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狀況。這些不友善的態度，來自部分台灣人對於東南亞的歧視和偏見。像是東南亞與落後、貧窮畫上等號，這些標籤從新移民第一代、轉嫁到新移民第二代身上。面對偏見造成的原因，有些新二代認為，台灣人所謂的世界觀，常常只有歐美，甚至下意識地認為，東南亞就是比台灣低一階。

受到這樣的環境影響，在新二代的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過令他們不舒服的言語和眼光。然而，隨著新二代年齡逐漸增長，當初因偏見與誤解造成的傷口，已經逐漸癒合，他們更希望這把看不見的利刃，可以永遠消失。

台灣能重新認識與尊重東南亞，是新二代們對於台灣社會的期許。他們也希望在未來，每一個新二代，都能驕傲地活出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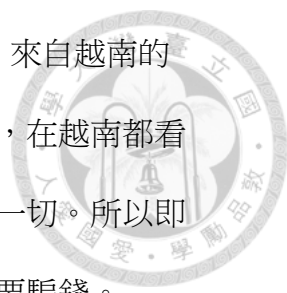
第四章 不該承受之重

「我聽電台講，外籍新娘辦到護照就會跑掉！」一個娶新移民配偶的台灣丈夫，這樣告訴台東移民署專員陳允萍。

這是一件讓陳允萍印象深刻的案子。那個新移民配偶已嫁來台灣八年，卻因為護照被丈夫扣留的關係，始終無法辦理身分證件。而她丈夫扣留她護照的原因，竟只是害怕妻子拿到身分證後就跑掉。陳允萍說，不論是好言相勸、嚴正警告，或是直接請專勤隊人員到他家說明，甚至採取法律途徑，她丈夫現在仍舊扣留著她的護照。他搖搖頭，無奈地說：「有些人對於新移民的負面觀感根深蒂固，不論是政策或是教育，都很難改變他們的想法。」

從最早的跨國婚姻潮開始，新移民在台灣生活的時間已經超過20年。這20年中，不論是政策方向、社會風氣都已變得更為尊重、友善。例如：申請歸化時間，已從五年縮短為三年，也有越來越多關心新移民的團體和媒體出現。但改變的風向，似乎難以吹向全台灣，仍有部分刻板印象根深蒂固。

買賣新娘



「我爸爸不贊成我嫁來台灣，他覺得好像在『賣女兒』。」來自越南的陳琳鳳說。她爸爸的反對其來有自。原來關於台灣的負面報導，在越南都看得到；離婚回越南的姐妹也會口耳相傳，自己在台灣所遭遇的一切。所以即使在越南，他們也知道，「台灣人認為她們嫁給台灣人，只是要騙錢。」

然而，這些關於台灣的負面訊息，並沒有影響陳琳鳳對於台灣的嚮往。雖在越南長大，從小她最愛看的是台灣的武俠片，最喜歡的明星是台灣的潘迎紫。在外人眼中，她就像飛蛾撲火。憑藉著對於台灣流行文化的熱愛，陳琳鳳不顧家人反對，也不介意那些負面報導，毅然放棄在越南的一切，嫁到一個未知、甚至可能對她不友善的地方。

或許是從小崇拜潘迎紫的關係，陳琳鳳身上也帶有一絲俠女氣息。她爽朗、樂觀且無懼。她形容自己是徹底的行動派，沒有太多的瞻前顧後，想去做就去做。陳琳鳳與丈夫是在越南經由相親認識，她笑說：「從見到老公到嫁給他，中間只經過了四天。」從四天前的陌生人，到四天後結為夫妻。她提到，雖然在越南有傳言說：「在台灣，要牽好先生的手，不然會被賣掉。」但一如她樂天的個性，她始終相信，自己會是幸運的那一個。

陳琳鳳嫁到台灣後，如願成為自己口中的幸運兒，那些「會被賣掉的傳言」煙消雲散，丈夫也十分疼愛她。直到她開始在法院、警局從事翻譯工作，她才知道：「真的有姐妹被賣掉！」

提起幾年前的往事，她仍氣憤又不可置信。她提到，有姐妹因為夫家的經濟狀況不好，不只被丈夫賣到特種行業賺錢，接著反被丈夫以行為不檢告上法院，最終離婚收場。她感嘆：「還好法官明理，才還那個姐妹公道。」



類似的事件，陳琳鳳說自己聽多了，「很多姊妹嫁來台灣都過得不好。」她無奈地說。新移民配偶懷抱著夢想和憧憬嫁來台灣，實際成為台灣媳婦後，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卻往往讓她們失望。

貧窮的想像

不同於那些因為婚姻初次到台灣的新移民，來自印尼的丁安妮，則是因為先來到台灣工作而認識丈夫。丁安妮20歲時，就背負了十幾萬了仲介費，獨自前往台灣工作。她說，會選擇到台灣工作，只是因為覺得好玩。

她到台灣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看護工，負責在醫院照顧生病的阿公。她說，那三年在醫院照顧阿公的日子真的很好玩。不只雇主一家對她很好，醫院內也有許多東南亞姐妹相互照應，醫護人員也都很友善，日子過得充實且開心。最後在因緣際會下，她嫁給了阿公的孫子，成為台灣媳婦。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嫁到台灣，因為穆斯林只能嫁給穆斯林。」丁安妮說。在伊斯蘭教義當中，穆斯林女性只能跟同為穆斯林的男性結婚。因此，從她丈夫求婚那刻起，她為此失眠了三個月。最後，她丈夫選擇皈依伊斯蘭

教，兩人終於可以共渡終生。婚後，她的身份從原本的看護工，成了妻子和媳婦。她說，婆家的人都對她很好，在身份的轉變上沒有任何不適應。但婚後，她卻第一次感受到不友善的眼光。



當身份從來台灣工作的印尼人，變成嫁來台灣的印尼新移民配偶後，對於丁安妮而言，從前那個好玩、友善的台灣，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變化。她說，大家知道她嫁給台灣人後，連路人會問：「老公花多少錢買你？是不是要賺錢回印尼？」這些問題讓她難以回答，也令她感到相當不舒服。「為什麼結婚後就不一樣了？」她到現在仍充滿疑問。

從前在醫院工作時，她從沒遇到這樣不禮貌的問題。丁安妮說，以前都待在工作的場域，較少與其他台灣人接觸。婚後在台灣過日子時，歧視才逐漸浮出。到現在即使已經嫁來台灣十幾年，也有個11歲的女兒，她說：「那些不禮貌的問題，仍層出不窮。」

這樣的偏見與歧視，來自台灣對於新移民配偶的刻板印象，以及自以為是的「高/低」分別。不論是買賣婚姻、來台淘金等標籤，都將東南亞視為貧窮、落後的地方；認為會嫁來台灣的新移民，一定是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想要「高攀」台灣。

丁安妮不只是《四方報》前編輯、翻譯、演員，甚至在2015年時，憑藉《幸福聯合國》的廣播節目，獲得第50屆廣播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的肯定。然而，現在的她去買衣服或是買菜時，店家仍會看著她說：「這個

很貴喔！你買得起嗎？」或是搭計程車時，司機誤以為她是來工作的移工，便跟她說：「來台灣工作很好吧！可以賺很多錢回去。」面對這些不友善的問題，她都是笑笑帶過，不會多做反駁，大多數衍過去。



被問到為什麼不跟司機說自己不是移工，丁安妮認為，他們既已帶有偏見，何必浪費自己的時間解釋。這樣的灑脫，連跟女兒的關係被誤會時，她的態度也依舊淡然處之。她提到，有一次女兒生病住院，她在醫院照顧，其他家屬見她便問：「你是來台灣照顧她的嗎？」她沒有反駁，也沒有說出，她其實是病人的媽媽。

「那些傷害都已經過去，只要家人支持我就好。」她說。不論是被誤認為是移工或是看護，那個當下，丁安妮都被隔離在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之外。事隔多年，傷口雖已愈合，仍留下淡淡的傷疤。她說，自己雖然早已可以申請台灣身分證，她卻沒有申請。除了因為要放棄印尼國籍外，另一個讓她不願申請的原因，則是她難以淡去的傷疤。她說，就算拿到身份證，台灣也不會把她當成自己人。「如果再放棄印尼國籍，我就兩邊不是人了。」丁安妮說。

兩種味道

多數的新移民在面對偏見與歧視時，表現出的是勇敢與樂觀。但當這些對於新移民的誤會和歧視，落在他們的小孩身上時，她們覺得問題很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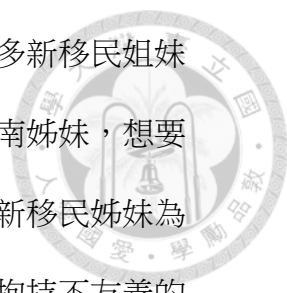
陳琳鳳說：「要讓小孩先認同自己。」她舉例，從小她就帶著兒子參加許多關於新移民的多元文化活動，耳濡目染之下，兒子對於新移民的觀感都非常正面，也常常在學校跟同學說自己的媽媽是越南人。



但有一天，她兒子卻悶悶不樂的告訴她說：「同學說我身上有越南的味道。」她當下雖然心疼兒子，卻沒有生氣或是委屈。反而告訴兒子：「你身上不只有越南的味道，也有台灣的味道。」她跟兒子解釋，有兩種血統就擁有兩邊的文化，可以讓你的生命更多元、更豐富。她甚至告訴兒子說：「你也可以問問同學，他身上有幾種味道？」經過一番開導，兒子逐漸展露笑顏，對著她說：「我知道了！他身上還有大陸的味道。」原來那個同學的媽媽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配偶。她回答兒子：「你同學也很棒啊！身上也有兩種味道。」

提到孩子因為身份而受到的誤會，丁安妮也說，她女兒皮膚黑，班上同學就笑她是「印度人」。回家後，女兒難過又氣憤，她便安慰女兒說，妳是印尼人，不是印度人。丁安妮並向女兒解釋，膚色是天生的，沒有優劣之分。最後用女兒在印尼語方面的優勢鼓勵女兒，要驕傲看待自己的身份。

「自己要先認同自己的文化，小孩子才會認同媽媽的文化。」這是新移民媽媽們共同的心聲。從小，丁安妮就用印尼語和女兒溝通，並帶著丈夫、女兒一起做禮拜、讀可蘭經。她笑說：「太久沒有做禮拜，女兒還會笑她偷懶。」



不同於面對母國文化大方、自信的態度的陳琳鳳提到，許多新移民姐妹嫁到台灣後就不願承認自己母國的身份。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越南姊妹，想要跟她打招呼，對方卻說：「我不是越南人。」她說，她能理解新移民姊妹為什麼不想承認自己的身份，因為台灣仍有許多民眾，對新移民抱持不友善的態度。但若連自己都不認同自己文化，又要叫小孩如何面對。

當面對這些不公平的待遇或是誤解時，不論是陳琳鳳、丁安妮，都是抱持著正向的態度。她們認為，會產生歧視的原因就是因為「不了解」，只要讓台灣人理解文化上的差異，歧視自然會被消除。

非關民生的需求

除了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歧視外，生活習慣、價值觀、人際關係等問題，也讓初來到台灣的新移民配偶，有更多不適應的情況。丁安妮說，結婚後，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沒有工作也沒有朋友，一度覺得很孤單。陳琳鳳也舉例，她因為生產完沒有人陪伴，而得了產後憂鬱症。當時她與丈夫住在一間小套房，沒有與其他親戚同住，生產完的那段時間，丈夫剛好到外地去工作，獨留她一個人在家照顧小孩。她說：「不知怎麼了，每到黃昏我就開始哭，一直哭到半夜。」不論是看她最愛的武俠片、或是唱她最喜歡的卡拉OK，都無法紓解她每到黃昏時的憂鬱感。

直到後來，婆婆、朋友常常來看她，帶她出門走走，才讓她不藥而癒，這才知道那是產後憂鬱症。她擔心地說：「連我這麼正向樂觀的人都得了產後憂鬱症，那些內向或是沒有人陪伴的新移民姊妹怎麼辦？」



現在的陳琳鳳一掃當時的寂寞和憂鬱，不只在各所學校擔任越南語老師，更積極參與新移民相關活動。走進高雄鳳山區的巷弄內，透天厝一樓的辦公室，擺放著簡單的辦公桌、沙發和一個小白板，最吸睛的則是各式各樣的獎盃、獎狀，和穿著東南亞傳統服飾的人形模特兒。這裡是由她一手創立的「高雄市新住民文創藝能協會」，由陳琳鳳擔任該協會理事長，幫助和她一樣境遇的新移民姊妹，並協助姐妹們可以找到多元興趣，並推廣東南亞文化。

在親友、同事眼中，陳琳鳳就是一個忙不停的工作狂，每天睜開眼睛就有滿滿的待做事項。但她充滿熱忱，在教學或推廣上都不遺餘力。很難想像大家眼中的女強人、工作狂，在嫁來台灣之前完全沒有工作經驗。「我也是跟老公吵很久，才可以出來工作的。」她說。

回想起這段爭取工作和讀書機會的過程，她說，丈夫的觀念比較傳統，希望她專心在家相夫教子，不要去上課和工作。甚至告訴她：「連台灣的大學生都失業了，你們外籍配偶唸這麼多書有什麼用？」或是反問她：「難道我養不起你嗎？」丈夫的態度讓陳琳鳳一度想要放棄，最後經過不斷溝通，終於讓丈夫改變觀念。

平衡自我與母親的角色



協會所擺放的服飾模特兒上，除了身穿鮮豔的越南國服外，特別讓人注意的則是，披掛在上面的獎帶。紅底緞面得獎帶上印著「模範母親」四個大字，那是屬於陳琳鳳最驕傲的頭銜之一。但曾經，她也一度在自我與母親的角色中失去平衡。

她提到，自己喜歡工作、熱愛學習，因此有一段時間，白天工作當翻譯，晚上則去補校學中文。每天都是一早出門，深夜才回家。直到當時讀幼稚園的兒子跟她說：「媽媽我們好像很少見面耶！」她才意識到孩子需要她更多的陪伴。因為兒子的提醒，她開始帶著小孩去補校唸書。她在教室上課時，兒子就往外頭玩耍。但這樣的陪伴卻不是兒子想要的，因為她只有在兒子身邊，卻無法全心全意的陪伴他們。

「媽媽你可以不要讀書嗎？」兒子對著她說。陳琳鳳說，那是她最掙扎的一刻。她因為喜愛中文而來到台灣，好不容易上完國小的補校課程，要升上國中了，卻面臨兒子的請求。最後，她選擇當一個母親，毅然暫停國中的學業。

嫁來台灣的新移民，除了部分因為經濟壓力而需要外出工作外，也有許多女性像陳琳鳳一樣，因為「閒不住」才想外出工作。這樣例子還有丁安妮，她提到，一開始丈夫也不准她到外面上班，直到女兒五歲時，她自己便

偷偷到住家附近的便當店，詢問中午時段兩、三個小時的工作機會；後來更
是以「幫忙」名義，白天到非營利組織擔任翻譯，晚上再到補校學中文。在
不斷跟先生溝通過後，才名正言順的到外面工作。



在丁安妮最忙碌的時期，除了拍戲，配音、編輯、主持電台樣樣來，晚
上回家後還要翻譯。連女兒都對她抗議說：「你陪我睡覺只有兩分鐘。」當
《四方報》停刊時，女兒高興地說：「你終於可以在家陪我了。」也因為女
兒這句話，才讓她知道，原來女兒多期待媽媽的陪伴。面對工作與家人間的
平衡，身為新移民，丁安妮體認到工作得來不易。她說，原本在印尼當老
師、護士的姐妹，到台灣後，卻只能到工廠、小吃店從事勞力工作。因此，
她很珍惜有現在的工作機會。

不論是丁安妮或是陳琳鳳，她們都認為自己是幸運的一群。在家人的支
持與幫忙下，才有外出工作、學習的機會，甚至開創出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
生活。但陳琳鳳也提到，不同於自己的幸運，在她所接觸到的新移民中，仍
有很多姊妹依舊困在家庭裡，無法爭取自己想過的生活。

嫁來台灣的新移民，多是抱持著對於未來的期待而來，她們是台灣人的
妻子、台灣人的媽媽，許多也已經領有台灣身分證，成為台灣人。但飄洋過
海來到台灣後，不只要面對大環境的不友善態度，人際關係也得重新建立。
若沒有丈夫、孩子的支持，便難以實現美好未來的期待。儘管社會的刻板印
象不易調整，還是有人選擇勇敢、選擇驕傲。



第五章 撕下新二代的負面標籤

2016年前後，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只要是關於新二代的新聞，標題不外乎是「雙語人才」、「東南亞尖兵」、「東南亞橋梁」、「台灣優勢」等正面報導。報導內容提及新二代擁有雙語能力、文化適應力，可以成為台灣前進東南亞發展的領頭羊。在現今東協熱潮，以及新南向政策的推展下，新二代成為當下最炙手可熱的人才話題。

然而，若將時間拉回到 2004 年，同樣的報導對象，當時的報導與政府官員對新二代的觀感，則多停留在中文不好、學業成績落後、適應力差等負面印象，更沒說新二代已經揹了許久的遲緩兒標籤。

遲緩的標籤

新二代出現負面的社會觀感，部分原因來自當時的醫學研究報告。2004 年間，台中榮民總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都曾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分別指出新二代發展遲緩比例有 26.47%及 63.6%，高於本地媽媽所生子女。但當時進行這項報導的林照真也指出，細看當時的研究，兩者的研究樣本都分別只有 102 及 109 人，實有過度推論之虞。

藍佩嘉也在《外籍新娘不是不停下蛋的母雞》中提到，根據 2004 年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當年新二代發展遲緩比例為 0.1%，並未高於國內六歲以下疑似發展遲緩兒的比例。



雖然後續不少學者紛紛提出證據，證明新二代遲緩兒比例與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但這樣的研究結果一出，媒體趨之若鶩地大幅報導，許多醫生受訪時又進一步強調，新二代在語言上的確有遲緩發展的現象，會影響他們在學習與適應上的表現。一時間，政府單位、專家學者開始紛紛將新移民的優生保健列為關注重點，認為新移民媽媽的衛教知識、中文能力是影響新二代健康與學習的關鍵，並將新二代定義為教育與健康上的弱勢族群。

當被問到新二代是否有遲緩問題或是學習表現比較差時，研究新二代學習表現多年的國北教大教育學院院長吳毓瑩則表示：「這問題是真的。」她說，當有這樣的擔心，就會看見這樣的事實。

吳毓瑩解釋，當時會有「新二代＝遲緩兒」的論述出現，是因為新二代進行遲緩兒篩檢的人數比一般台灣小孩多，篩檢的母群體變大，篩檢出的遲緩兒數量自然也會提升。

「但這並不代表新二代遲緩比例高，而是母群體大小的問題。」吳毓瑩提到，當時新移民媽媽帶小孩去衛生所看醫生時，醫生通常會請她們帶小孩去做測驗；但台灣小孩卻很少被要求做篩檢。如此一來，新二代被篩檢出遲緩兒的比例自然提高。而當衛生所感覺遲緩兒數量變多時，自然聯想到這些遲緩兒的

媽媽大多是新移民配偶。在這樣的錯誤推論之下，造成新移民家庭人心惶惶，紛紛前去篩檢，又讓母群體變得更大，篩檢出的遲緩兒數量也隨之提升。



同樣的道理，吳毓瑩認為，當有人擔心新二代學習表現差時，必然會放大所看到的結果。她提到，當時關於新二代學習表現較差的研究，研究者的訪談對象多是學校老師，而非新二代本人。她說，從老師的角度而言，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本來就有正常的高低分布現象，「如果新二代學業成績不好就會特別關注，也會放大那樣的印象。」吳毓瑩說。

新二代出博士

針對新二代學習表現差的報導，印尼新二代何景榮認為，完全是「先射箭，再畫靶」。他解釋，很多報導是根據相關研究而來，這些研究多是選擇經濟弱勢的新二代作為研究對象。家庭的經濟狀況確實會影響小孩的學習表現，但並不是因為媽媽國籍的關係。「如果將學習表現落後的新二代，類推到所有的新二代，不只研究的樣本數不足，研究推論也沒有根據。」

何景榮自己就是推翻遲緩標籤的例子。他在政大讀完碩士後，拿到獎學金，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完成博士學位。何景榮不只精通中、英文，也在印尼大學修習過高階印尼文課程，現在則在暨南大學東南亞語系擔任兼任助理教授。何景榮在網路專欄的名稱為「台灣歐巴馬」，因為他認為，所有新二代都該與黑白混血的歐巴馬一樣，擁有跨文化的先天優勢與出人頭地的未來。所

以當被問到關於新二代學習表現差的研究時，他說：「我從小成績優異，國文也常常拿滿分，完全沒有比較差。」



何景榮自己曾經針對新二代的學習表現做過研究。他發現，無論是新二代或是台灣小孩，成績都是屬於正常的常態分佈，但當新二代學習表現不好時，卻會被歸因到母親的國籍。他認為，老師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觀念錯誤的老師會認為，學習中文與媽媽母語之間會有衝突，因此，會叫新移民媽媽不要跟小孩說母語，以免影響新二代的中文學習。

以他自己為例。他說，自己從小就跟媽媽講印尼文，中文發音或是學習卻沒有任何影響。他舉例，有一次在國小考了全校第一名，國語還拿滿分，當老師在台上嘉獎他的同時，台下就有同學舉手跟老師說：「可是他媽媽是印度人。」他立刻回應說：「不是，我媽媽是印尼人。」老師卻馬上接話解釋：「他媽媽是華僑，也是中國人，所以中文才會好。」他說，當下的他滿腹疑問，因為他媽媽是印尼人，不是華僑，也不太會講中文，為什麼老師明明沒有見過他媽媽卻做出這樣的解釋。

回想當時的情景，何景榮認為，大家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是新二代中文不好、成績不好，甚至在 10 幾年前，只要媽媽是來自東南亞的新二代，不論成績好壞，一律要去上學校所開的中文輔導課。

他認為，新移民第一代跟第二代所面臨的問題完全不同，新移民第一代可能真的需要中文的輔導，但對於新二代而言，媽媽的母語反而是他們要加強的

部分，至於學習上的輔導則應該用在真正有需要的學生身上，讓教育資源能更有效率地被運用。



新二代一點都不差

吳毓瑩曾發表過多篇關於新二代學習表現的研究。在《東南亞裔新移民女性之子女的學業成就真的比較差嗎？與本地對照組比較之三年追蹤探究》的研究中，以國小一到五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控制雙方父親的教育程度在相似比例，追蹤 422 名新二代與 400 名本地學生進行三年研究。其中，有 64.5% 的新二代父親，以及 63% 的台灣學生父親，最高學歷在國中以下，皆高於全國平均的 25.4%。她的研究結果顯示，當新二代與台灣小孩父親的教育程度相當時，雙方學習表現則沒有太大差異。

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馮涵棣，長期研究越南新二代與媽媽的互動關係，以及新移民在台灣處境。她說：「新二代就是台灣小孩，沒有什麼不一樣。」她認為，會對新二代有學習表現較差的印象，完全是錯誤標籤。她提到，在她的研究當中，或許新移民媽媽無法直接給予小孩學業上的幫助，但不代表她們不重視小孩的教育。

除了課業表現之外，馮涵棣在《私領域中之跨國化實踐：由越南媽媽的「台灣囡仔」談起》研究中也說，以越南媽媽為例，她們更加重視小孩的品格教育，以及禮貌的養成。因為她們認為，有禮貌的孩子會充滿感情的待人，而重感情的人，則會因在意別人感受而重禮貌。在越南文化中，有稱為 *vòng tay*

(越南南部稱為 *Khoanh tay*) 的肢體語言，是指將雙手環抱放在胸前，用來對長輩表達尊敬與禮貌之意。



馮涵棣研究時就觀察到，不論是與長輩問好、收禮物或是受責罵時，孩子們都會很自然地做出 *vòng tay* 的動作，無疑是越南媽媽給孩子另一種教育的方式。

遲緩的烙印

2004 年前後，針對不利於新二代的研究風氣與媒體報導，造成新二代長期背負「不健康」、「發展遲緩」的標籤。雖然幾年後，不論是政府或是專家皆推翻先前的結論，用更嚴謹的研究方法，進行長期且規模更大的追蹤研究，最終研究多顯示，新二代的健康或是學習表現與本地小孩無異。

但即使到了 2014 年，距離那些不利於新二代的研究已經過了 10 年。高雄醫學大學家醫科主任，在《旗津，下一站的幸福》的報導中仍寫到：「旗津是高雄市外籍配偶比例偏高的區域，因此兒童發展遲緩的比例和高雄市區相較也偏高。」該報導雖然是在提倡幼兒早療篩檢，無形中依然暗示，兒童遲緩原因歸咎於新移民媽媽。

印尼新二代何景榮認為，媒體的影響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他認為，那些不利於新二代的研究雖然被平反了，但錯誤觀念依舊深植人心，因此直到到

現在，仍有人會質疑他的中文能力。他只能無奈回答：「我從小到碩士都在台灣讀書，中文會不好嗎？」



新二代中文一定不好嗎？

目前新二代在國小、國中人數已經超過 20 萬人，「遲緩兒」的說法早已不攻自破。新北市擁有將近 10 萬名新移民配偶，數量居全國之冠。以新北市立福營國中為例，就有超過 15% 的新二代學生，在全校 60 個班級當中，每班至少都會有一到兩位的新二代。擔任福營國中國文老師的王翊亘就說：「新二代的學習表現跟一般學生沒有差異，甚至有非常優秀的例子。」她提到，班上有一個菲律賓的新二代學生，除了課業表現名列前茅，也因為小時候在菲律賓生活的關係，英文非常流利。這不只讓他本身很自豪，班上同學也將他視為學習對象。她說，這名新二代直到國小三、四年級才從菲律賓回到台灣讀書，除了一開始國語成績較落後外，其他學科的表现都很優秀，但那位新二代很努力學習中文，到現在不只國文成績優異，作文也寫得相當好。

但王翊亘也提到，班上另一名越南新二代小家（化名）則有遇到學習上的困難。雖然小家從小都在台灣長大，卻承襲了媽媽的中文口音，甚至反應在他的中文學習和書寫上。她舉例，小家會將「很慘」說成「很ㄗㄢˊ」，因此，當他在書寫的時候就會寫成「很殘」。

王翊亘表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口音，她一開始也沒有特別注意小家的口音問題。但當他的口音已經影響到他的中文書寫時，王翊亘便開始糾正他的

發音，以免影響他在背註釋、寫作文時的書寫。但除小家外，王翊亘教過的新二代學生，都沒有類似狀況。



跟小家聊過後才知道，因為爸媽工作忙碌的關係，外公、外婆特地從越南來台灣照顧他；直到他上國小後，他們才回去越南。再加上，他的阿姨們都嫁來台灣，因此，幾乎每天都由外公、外婆或是阿姨們照顧。耳濡目染之下，越南文成為小家小時候最熟悉的語言之一。

但在小家心中，國文是他學習表現最好、也是最喜歡的科目。口音對他而言，似乎沒有造成困擾或是影響學習意願。

除了小家外，更需要政府介入幫忙的，則是在東南亞長大、但國小或國中後才返台就學的新二代。他們大多是父母在台灣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因此被托付給媽媽在東南亞的外婆家或是親戚照顧。直到父母經濟穩定，或是年屆入學年齡，才被父母接回台灣生活。在沒有中文基礎的情況下，這些新二代很難跟上學校的進度，成績自然落後。

越南籍新移民陳琳鳳提到，因為自己教越南語，就曾遇到這樣情形的新二代。她說，該名新二代從小就在越南長大，所以當他回台灣讀書時，中文程度根本跟不上同年紀的學生，造成原本回台灣該升四年級的他，只好從二年級念起。她表示，在別人的介紹之下，她擔任起該名新二代的中文家教老師，利用越南文教他中文，學生已經有明顯進步。

缺少雙語能力的老師



像陳琳鳳這種懂越南文、中文，又有教學經驗的師資非常難找。她自己也表示，該名新二代所就讀的學校，目前沒有越南語的師資可以提供協助，而她也分身乏術，可以幫助的新二代人數有限。如同該名新二代所遇到的中文銜接問題，福營國中也有不少類似的形況。福營國中輔導處主任李志芬就表示，校內有少數學生有類似的背景，國中才回到台灣就學，學習中文對於他們而言成為一大課題。

李志芬提到，自己本身在教數學時，就遇到有新二代，並不是學習能力有問題，而是因為中文不好，上課如同鴨子聽雷，只能呆坐在下面，逐漸失去聽課的興趣，成績自然沒有起色。眼看如此，她決定調查校內有共同問題的孩子，由班級導師評估學生狀況，挑選需要加強中文輔導的學生，成立中文專班給予他們額外的協助。李志芬表示，目前中文專班有 6 名學生，包含從越南、印尼、美國回來的學生，提供他們每週一次的中文輔導。

但李志芬也提到，中文班的師資找尋困難，原本是請一位越南籍的新移民做中文教學，後來發現他並沒有教學經驗，上課情況不如預期，因此又退回原點，重新尋找適合的師資。她表示，在尋找師資方面，教育部沒有辦法給予任何協助，只能靠學校自己向外尋求師資，在不了解老師背景或是教學經驗的情況下，只會浪費更多行政資源，也耽誤開課的進度。

教育必須多元



新二代所面臨的教育問題，除了少數新二代需要中文能力的加強外，大部分的新二代在學校老師或是教育專家眼中，都不需要特別輔導。能夠讓新二代快樂學習的關鍵，反而是教育現場的友善態度，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

回憶起教育現場的不友善，越南籍新二代曾郁晴說：「我也是在台灣長大啊！又不是不識字！」她說，國小時的環境確實不如現在友善，因此，當國小老師在班上做父母國籍調查時，為了怕被同學歧視，或是嫌她媽媽講話有口音，她總是不敢當場舉手說媽媽是越南人，只敢在下課後默默跑去找老師。

印尼籍新二代徐樺姿也說，當時國小老師以舉手方式，調查父母國籍，但當她看到班上與她同為新二代的同學在調查時沒有舉手，自己也不敢舉手了。他們都表示，自己沒有要隱藏媽媽身份的意思，但在當時的班級氛圍之下，仍會擔心承認身份後，老師、同學對於他們是否會有異樣眼光。

學生父母的國籍調查行之多年，由教育部發文，請各級學校針對國小、國中的新二代人數進行調查，調查方式則由學校自行決定。受訪的部分新二代表示，國小、國中時期學校有做過類似調查，有些是直接請新二代舉手，有些則是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福營國中輔導老師蘇郁珺表示，他們學校是請學生或是家長填寫基本資料卡，當中有一欄為「新住民」的選項，可以勾選父親或是母親的國籍身份。但訪問當下，王翊亘也發現，小家並未在資料卡上勾選媽媽的

新住民身份。但她說，無論是學校或是她本身，都會尊重學生的選擇。



根據內政部 2015 年資料統計，桃園市的新移民配偶人數達 55576 人，僅次於新北市及台北市。位於桃園龜山區的壽山國小，全校共 242 名學生當中，就有 50 人是新二代，比例超過五分之一。老師江秀娟表示，他們學校是由老師自行設計父母國籍調查表，請小一學生帶回家給父母填寫，後續的身份別就會登記在他們的輔導資料當中。若之後有新二代獎學金，或是其他針對新二代的教育政策，就可以直接從記錄中找到符合的名單。江秀娟所帶的班級共有 19 名學生，其中就有 5 人是新二代，超過四分之一的比例。

在 16 年的教書生涯當中，江秀娟表示，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不論是在國語、英文、社會或是綜合課的教材中，都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入，老師在寫課程計畫的時候，也必須結合多元文化教材。

開出多元的花朵

「多元文化教育對於新二代的自我認同，有一定的影響力。」江秀娟說。她說，近年來，新二代對於媽媽的身份認同都很正面。例如，菲律賓的新二代會主動與同學分享她回外婆家的點點滴滴，當課程上到各國的飲食文化時，班上的一小一學生就會主動舉手說：「我媽媽是越南人，我有吃過河粉。」或是會主動分享越南的飲食習慣。例如：火腿不用煎，可以直接吃。這時，班上其他學生就會很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老師也會藉機教育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多元飲食習

慣，整體氣氛相當融洽。



隨著新二代進入國小人數逐漸攀升，多元文化教育成為重要的教育方針。台北市中正區的忠義國小，因位於南機場夜市附近，觀光客所見，盡是夜市所帶來的人潮與喧騰。然而，他們看不到的則是，因都更帶來的廢校危機。

忠義國小學區內有將近 300 戶的中低收入戶，校內也有四成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其中，新二代學生人數，佔全校 37.4%，有將近四成的學生來自新移民家庭。忠義國小教輔處主任陳志強表示，學校的新二代人數眾多，因此不只開辦了一週一次的越南語課程、多元文化體驗營，在學校的環境佈置方面也下足功夫，像是介紹東南亞國家的海報、認識東南亞傳統服飾等，讓學生從校園內的佈置就可以認識東南亞文化。

忠義國小還有另一項貼心的措施，是請學校的越南籍媽媽協助，將家長通知單翻譯為越南文，讓中文不是那麼好的新移民媽媽，也能夠參與學校活動，了解小孩的學習狀況。

陳志強提到，以前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文化的認識較少，所以新二代會覺得自己的身份很突兀，甚至是感到自卑。但現在不論是課程或是學校活動，都會融入多元文化教育，新二代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對於自我身份認同都相當正面。

除此之外，忠義國小也針對家庭關注較少，或是媽媽中文能力不足無法協助

課業的新二代，進行課後輔導。除了一般的學科輔導外，其中也包括「自我認同」的課程，目的在於鼓勵學業表現不突出的新二代，能找到在體育、美術等方面的專長。陳志強說：「不要用成績去否定學生，要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多元能力。」



第六章 拾起媽媽的文化

曾郁晴拿在手上的，是一幅只有綠色顏料的畫作，其他顏色彷彿被吸進另一個時空。白紙上，除了深綠、淺綠、墨綠、青綠、草綠等各種綠的交疊外，沒有其他色彩，卻讓人印象深刻。「我最討厭綠色，所以讓外公用剩下的綠色顏料幫我畫了一幅畫。」越南新二代曾郁晴，指著桌上那幅護貝後的圖畫笑說。

最討厭也最愛的綠色

曾郁晴解釋，這張圖，是外公從越南來台北找他們時，給她隨手畫下的一幅畫。圖中，最右邊有一棟矮房子，房子旁還有一棵高大的椰子樹。曾郁晴說，外公畫得是越南的老家。而整幅畫的左邊，則是她要求外公畫下的大蝴蝶，幾乎佔了整幅畫的一半。她笑說：「不知道要畫什麼，就叫外公畫了我喜歡的蝴蝶。」

對於曾郁晴而言，雖然整張圖都是用她最討厭的綠色所畫，但卻是她最喜

歡、也是最寶貝的一幅畫。除了採訪當天帶來現場之外，其他時候都是貼在家裡的牆上，從沒拿下來過，因為那是她外公留給他唯一的一樣禮物。




曾郁晴的外公在畫完那張畫後，就回到越南，這之間她未曾再見到外公一面。直到兩年後，半夜的一通電話，她才從媽媽口中得知外公過世了。她永遠記得那晚，全家被深夜響不停的電話吵醒，接起電話後，媽媽原本沈默不語，卻突然哭喊：「為什麼我現在在這裡！我沒有見到爸爸最後一面。」

還只是國小年紀的曾郁晴，當下還未能意識死亡，眼淚來不及流出，只是愣在原地。不料媽媽卻轉身、用指責的語氣問她：「你為什麼不難過？你是不是忘記外公了？外公不是對你很好嗎？」對於媽媽的指控，她說，當下沒有任何反應，無法反駁媽媽，卻一直在心中吶喊：「我不是沒有感覺！」最後只能默默進房間睡覺，用自己的方式緬懷外公。

隔天，曾郁晴拿出外公的畫交給媽媽，媽媽一聽到是外公畫的畫，二話不說拿去護貝，貼在家中牆上，並欣慰地對著她說：「還好你有叫外公畫畫。」從此，只要他們想念外公，就去走去看看那幅畫，成為思念外公時的一大慰藉。事過境遷，曾郁晴並沒有埋怨媽媽當時的指責，她選擇理解媽媽的悲傷，因為她知道，媽媽是因為害怕他們忘記外公、忘記越南的一切，忘記那個屬於媽媽的家。

除了外公的畫作外，訪問當天，曾郁晴也帶了另一樣「綠色」的東西，那是一件黃、綠相間，暈染出十份淡雅顏色的越南傳統國服「襖黛」（越式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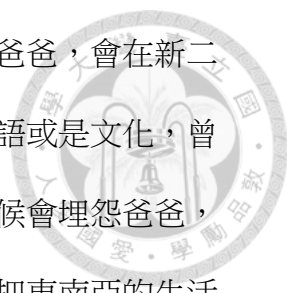
袍)。「襖黛脖子跟腰際間都有扣子，也因為它通常比較薄，所以裡面還有一條褲子搭配著穿。」她滿心歡喜的拿出襖黛並介紹它的穿法，看得出她對於這件衣服的喜愛。被問到襖黛為什麼買是她不喜歡的綠色時，她笑說，因為那時候沒有跟媽媽一起回越南，媽媽問她有沒有要什麼禮物，她就拜託媽媽，幫她帶一件襖黛回台灣。

「其實滿好看的啦！」她端詳著那件綠色襖黛說。在喜愛的襖黛面前，她不喜歡的綠色彷彿也沒那麼討厭了。

不說媽媽母語是避免傷害

曾郁晴從小就熱愛越南文化，常常黏著媽媽要她教她越南話，或是告訴她關於越南的事情。縱使她的媽媽沒有教她越南文，也沒有刻意讓她接觸越南文化，還是不減她對於越南的喜愛。她不只愛吃越南料理、喜愛越南服飾，更拜託媽媽從越南帶回國小一年級的越南文課本，希望可以從頭開始學習越南語。

然而，關於越南的一切，曾郁晴並不是得到的理所當然。她說，小時候媽媽不願談及關於越南的事情，若繼續追問只會得到「你不覺得在台灣講越南的事情很丟臉嗎！」或是「你學越南文幹嘛？又沒有用！」等回答。她說，直到近年來，東南亞崛起，電視上關於越南經貿發展的新聞越來越多，媽媽才一改從前的態度，鼓勵她學越南文甚至到越南去發展。



有部分新二代的家庭，不論是新移民媽媽本身，或是台灣爸爸，會在新二代的成長過程中，不刻意教導、甚至避免他們接觸到媽媽的母語或是文化，曾郁晴的成長經驗不是唯一例子。泰國新二代小逸就表示，有時候會埋怨爸爸，不讓小時候的他們學泰文，而是希望他們「活得像台灣人，」把東南亞的生活習慣抹掉，去符合台灣人的標準。她說，「自己明明可以擁有更多，」卻因為爸爸認為講泰文會被歧視；而媽媽也因為覺得大環境不友善，而認同爸爸的看法，因此錯失了學習泰國語言和文化的機會。直到大學時期，才自己開始自修泰文。但她也認為，爸爸有這樣的想法，是善意的希望可以「避免傷害」。

小逸認為，要培養新二代有學習媽媽母國文化的動力，是需要大環境的配合。以她為例，在她成長時期，台灣就有許多關於泰國的進口食材，或是相關的文化輸入。如近年來很火紅的「泰劇」，或是泰國旅遊熱潮，但在她大哥、大姐的成長時期根本看不到泰國電影。因此，相較於她跟年紀相仿的二姐，大哥、大姐對於泰國文化的認同就相對少很多。

撿起失落的文化認同

小逸說，近年來，她跟二姐開始跟著泰劇學泰文，自己也主動開始學起泰式料理。她發現，主動去親近泰國文化後，也讓她跟媽媽之間多了更多以前沒有的交流。她舉例，以前媽媽很少提起關於泰國的事情，但在跟媽媽學習泰國菜的過程之中，媽媽會聊到她為什麼喜歡吃這道泰國菜，就開始侃侃而談關於泰國的事情。或是媽媽提到，有一次她自己穿了一件鮮艷顏色的衣服，去泰國

駐台辦事處辦事情，去到那邊看見大家黑衣素服，才想起泰皇姐姐最近去世。她媽媽趕緊披上一件黑外套，化解這份尷尬。



小逸說，在泰國人心中，皇室是至高無上的象徵，泰國人都非常尊重皇室成員。媽媽也並順便告訴她，每個顏色在泰國所代表的意義。

對泰國人而言，一週七天都有不同的幸運色和禁忌色，週一至週日的幸運色按順序為：黃色、粉紅色、綠色、橘色、天藍色、紫色、紅色。而星期一剛好也是已故泰皇蒲美蓬出生的日子，因此，大家會在已故泰皇蒲美蓬生日當天，不約而同穿上黃色服飾以表祝賀。這些關於宗教或是文化的顏色意義，也成為泰國人重要的生活常規。她提到，這些都是平常不會刻意聊到的話題，只會在某個親近泰國的時刻，媽媽才會不經意跟她分享。

小逸說，她很想知道媽媽的很多故事，但在日常生活中，總少有機會可以親近這些話題。「只有在觸碰到某些界限的時候，媽媽才會跟我聊起泰國」。就像上述的例子一樣，她認為，關於泰國的事物都是在生活中不經意地了解到，她不認為自己學習泰文、泰式料理或是了解泰國文化的目的，有強烈到像是在尋根。其實，她只是可惜自己，沒有把握天生的機會，好好學習另一個文化。

被問到關於身份上的認同，她表示，自己在台灣與泰國文化間的親近與了解程度，落差太大。「我可以很自然地說我是台灣人，卻無法很自然地說自己的泰國人。」小逸說。她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血統是台灣、泰國各一半，但對於

文化的認知卻嚴重失衡，於是她開始補回關於泰國那一半。



打開小逸的個人部落格，裡面有接近 30 道的泰式料理教學，不論是常見的涼拌青木瓜絲、打拋豬肉、泰式綠咖哩，或是台灣少見、但屬於泰國國民小吃的西米露豬肉丸、椰奶粽子、芒果糯米椰汁飯等，不只食材準備齊全、料理步驟清楚，照片也拍得色香味俱全，甚至在教學中還附有泰式香料介紹、料理起源、道地食材購買地點等，讓人不只讀的食指大動，更加了解泰國的飲食文化。

除了胃要貼近泰國外，小逸連婚禮也很「泰」。對他們家而言，婚紗是傳承婚姻美滿與幸福的幸運物；如同歐美文化中，女兒會傳承或是重製媽媽的婚紗，彷彿穿上母親的祝福與家族的情感。

在小逸家中，也有這樣的習俗。她跟她的二姐，在結婚當天，都選擇穿上泰國傳統服飾，象徵傳承媽媽的文化與幸福。她們不只跟媽媽飛到泰國挑選婚禮服飾，結婚當天更與丈夫連換多套泰服，再加上中式龍鳳掛、西式的純白婚紗。婚禮當天，小逸身體力行體了文化的多樣性。

小逸提到，當穿著泰服的婚禮照片刊在網路上後，許多跟她一樣身為泰國新二代的網友，紛紛詢問相關細節，也想穿著屬於媽媽的服飾出嫁。但她說，很多想穿泰服的新二代，還是過不了台灣婆婆那關，很難一圓泰式婚禮的夢想。她自己則是比較幸運，無論是丈夫或是婆家都很支持穿泰服的構想，讓她得以延續家族間的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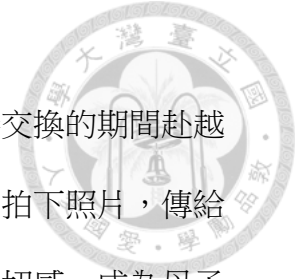
小逸在高中後，逐漸發現自己雖身為泰國新二代，對泰國卻沒有文化親近感，於是她開始一步步找回關於泰國的認同。在近十年的過程後，她謙虛地說：「有進步一點點了。」她認為，文化認同是成為泰國人的第一步，於是她會主動介紹媽媽是泰國人，凸顯出自己屬於泰國的部分。

新二代不是沒有根的浮萍

多數新二代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或是追尋是到大學後才開始，甚至有些人是到大學才知道「新二代」這個名詞。對他們而言，媽媽母國對於他們的影響，細微到只有餐桌上的食物，才讓他感受到另一個文化的存在。媽媽為越南籍的新二代蔡宇傑所說：「在被標示為新二代之前，我活得跟一般的台灣人一樣。」

蔡宇傑拿出一張 2012 年的報紙，報紙上大大的標題寫著「越配子蔡宇傑第一人到高中教越語」，並配上他與媽媽的合照，還有他代表「優秀新住民」到總統府被總統接見的照片。他說，除了家裡餐桌上的生春捲、河粉和鴨仔蛋外，「在那篇報導之前，我就是個一般的台灣人。」

蔡宇傑在越南語、越南文化的鑽研有目共睹。不只在各高中教越南語，訪問當天，他更受邀擔任立委助理的越南文化講師，課程結束後才匆匆從立法院前來受訪。得知蔡宇傑的越南語教學經歷，很難想像他大學以前完全沒有學過越南語。他說，是受到哥哥的影響，才在大一時選修了越南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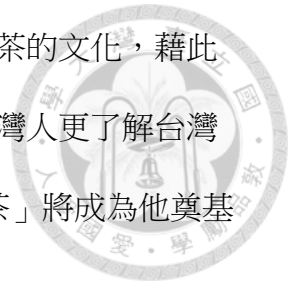
與蔡宇傑同樣就讀政大的哥哥，在大學時期，利用在香港交換的期間赴越南旅遊，不只走訪南越各地，更特地回到媽媽小時候的故居，拍下照片，傳給在台灣的媽媽。看見媽媽的感動，更加深他哥哥對於越南的親切感，成為母子間的親密反饋。後來在他哥哥大四、他大一時，政大首開越南語課程，兩兄弟於是開始一同學習越南語。

不只在校內學習越南語，2010年的大二暑假時，蔡宇傑選擇到越南胡志明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進修越南文。他笑說，那是他第一次「回」越南。他說，剛開始學習越南語、或是回越南遊學等，對他的自我認同沒有影響，只是變成他的個人特色。他表示，會開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是到2012年被媒體貼上「新二代」標籤後才開始。

「被貼上新二代標籤後，就被歸類漂移的人。」蔡宇傑說。他認為，在台灣人眼中「新『移』民」就象徵著身份的流動，是屬於漂移的族群；而「新移民第二代」，也會被看作相同的漂移者。自從那篇報導後，他就被定義為「新二代」，這是他活了20幾年來從沒想過的身份。而這個由台灣媒體賦予他的標籤，一夕間，讓他感覺自己成為台灣人眼中的浮萍。他說：「我的根其實很明顯，我從小在台灣生長，我就是台灣人。但在台灣人眼中我就是沒有根，隨時都有可能漂移。」

為了扎實自己在台灣的根，也為了讓台灣人覺得他有厚實的文化根基，蔡宇傑選擇去研究「台灣茶」。大學時期，他曾在貓空的茶館打工，那是他與茶文

化的初次相遇。然而，被貼上新二代標籤後，他決定重拾台灣茶的文化，藉此尋找自己的群族認同和文化根基。他認為，如果他能比其他台灣人更了解台灣茶文化，代表他的族群認同是清楚的，文化認同是強烈的，「茶」將成為他奠基台灣文化的基石。



蔡宇傑對於茶文化的推廣不遺餘力，多次擔任講師、舉辦講座讓大家了解茶文化之美，他認為，自己的新二代身份優勢，讓他更可以用越南角度去看台灣茶，擁有多元的觀點，加強雙邊文化上的交流。

蔡宇傑笑說：「這就像一種反抗。」別人越認為他沒有根，他就越努力鑽研台灣茶文化，藉由茶的文化去告訴別人，自己是怎麼扎根在台灣的。

如今，蔡宇傑不但能說流利的越南語，也能喝出道地的台灣好茶。「那篇報導對我影響很大。」他笑著解釋，原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與生俱來的資源，是報導後才發現自己的特色優勢。雖然報導一方面好像挖走了自己的根，但另一方面也給他謀生的機會。他說：「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現在反而發現自己是有特色、有優勢的。」

不想只做「新二代」 我想做自己

蔡宇傑認為自己被貼上新二代標籤後，更有正當性去推廣越南語言和文化。但不同於蔡宇傑對於新二代標籤的積極作為，媽媽為印尼籍的新二代楊麗

娟則不適應被貼在身上的新二代標籤。因為她強調：「新二代不是我的全部，卻成為我的代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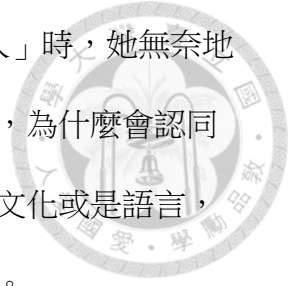


楊麗娟第一次認識「新二代」這個詞是在升研究所的暑假，那年暑假她參加了龍潭當地的文化導覽活動，要幫忙佈置與《四方報》合作的成果展，將展出東南亞移工的書信，並將會場佈置成屬於東南亞移工的房間。主辦單位得知她媽媽是印尼華僑後，就將東南亞的主題縮小成以「印尼」為主，並將佈展工作交給她處理，希望她打造出「印尼人的房間」。她說，剎那間，她從一個當地普通的青年，成了「印尼華僑的後代」。那是 20 幾年來，她從來沒有被凸顯過的身份。

楊麗娟接下佈展工作後，立刻尋求媽媽的幫忙，當時的她對於印尼一無所知，只能拜託媽媽幫忙完成佈置。她說，從小成長過程中，她很少邀請媽媽參與她的學校生活，因為她了解媽媽對她參與的活動沒有興趣。但那次佈展，她說媽媽非常積極且樂於幫忙，並找了許多同為印尼華僑的朋友幫助，不只幫忙佈置房間，更親手做了印尼點心、擔任助理主持，還演唱了印尼的愛國歌曲。她說：「我很少看到媽媽表現出這一面。」

但在展覽期間，楊麗娟說，自己被別人介紹的頭銜就只剩下「印尼華僑的後代」、「他媽媽是印尼華僑」後，那個有自己個性和喜好的「楊麗娟」似乎不見了。她提到，展覽時，大家會一直問她關於印尼的事情，但她卻講不出大家期望「印尼華僑後代」該知道的答案。

因此當有人問她：「你自我認同是偏向印尼人、還是台灣人」時，她無奈地回答：「當然是台灣人啊！」她很納悶，「她從小都在台灣生長，為什麼會認同自己是印尼人」？她說，大家會期待新二代應該要認識媽媽的文化或是語言，但以她自己為例，在展覽之前，她對於印尼的了解真的非常少。



楊麗娟說，在參與展覽以前，覺得印尼就是「異國」，雖然可以從媽媽身上找到熟悉的印尼事情，像是食物或是親戚，但依舊感覺與印尼很疏遠。直到經歷完展覽，開始認知到要「補滿」自己另一個身份認同。但她說，對她而言，這個「補滿」的過程，有點像是在對別人交代，要做到別人眼中「新二代」或是「印尼後代」該有的文化認知，以免之後被問到關於印尼的事情都還要再問媽媽。

那場展覽後，楊麗娟突然被賦予了新二代的身份，她說，新二代這個詞的背後代表了很多意義，但不一定適用在她身上，因為她認為自己受到印尼文化的影響很有限。也因為是印尼「華僑」後代的關係，讓她覺得自己不那麼像是新二代。但她說，再有這樣的疑慮後，看到同為印尼華僑後代的陳又津，在她的新二代書寫中也包含了很多對於東南亞華僑後代的書寫，她才理解，或許對於社會大眾而言，新二代與華僑二代的界線沒那麼清楚，一樣是來自「東南亞」的後代。

「在大家的心中我可以當一個新二代，但我不會主動跟大家說我是新二代。」楊麗娟說。她不喜歡別人將新二代身份作為認識她的全部，她也不認為

「新二代」的身份，可能變成她的競爭優勢。她覺得，強調新二代身份就好像白人與墨西哥裔混血第二代，卻刻意強調自己的墨西哥裔身份一樣不自然。



她認為，血統是天生的，她從不想利用自己的新二代身份，就連碩班的研究題目，也避免與自己的身份有關。楊麗娟說，她還有很多特質，若別人對她的認識，只剩下「印尼華僑後代」或是「新二代」等標籤，將會讓她很不開心。但她也表示，自己對於印尼、移民的關注不會停止，會用不同方式持續關心、回饋在這些議題上。

多數新二代皆是到進入高中，甚至大學以後，才逐漸找到對於媽媽母國的認同感和親切感。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或是當新二代接觸到更多東南亞文化時，開啟了他們對於自我認同的追尋。如今，已有更多新二代擺脫以往的隱藏、說謊，到現在能夠大方介紹自己、並認同自己的新二代身份。或許他們仍講不好媽媽的母語，也從沒去過媽媽的家鄉。但他們已經拾起關於媽媽文化的那塊拼圖，並且放入自己的人生故事中。



第七章 南向列車啟動後

在總統蔡英文上任後，新南向政策成為政府外交與經濟的重點項目之一。東南亞在國內各個政府部會、各家媒體間的討論度快速上升。不論是政策制定方向，或是新聞媒體的東南亞專題，都讓大家的目光聚焦在東南亞地區。

然而，南向政策一點都不新，早在 1990 年代，李登輝政府就已經提出南向政策的構想，將台灣的經貿投資轉向東南亞市場。在這段期間內，台商前仆後繼地前往東南亞投資，成為台灣重要的貿易夥伴。根據經濟部進出口貿易量

統計資料，2015 年，東協 10 國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佔整體出口比重的 18.1%，僅次於中國大陸。



雖然這 20、30 年間，台灣人不間斷地在南向，但原本老舊且緩緩前行的東南亞列車，在換上新南向政策的火車頭後，不只重新鳴笛大響吸引台灣人目光，嶄新的動力更加速帶動列車前行，讓更多人想搶搭這班開往東南亞的列車。

東南亞卡位戰

隨著南向列車的啟動，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將目光轉移到東南亞。但在新南向政策發布前，就已經有許多人看準東協經濟的崛起，希望搶先到東南亞卡位，再加上南向列車的啟動，讓更多人嚮往搭上這班順風車。最明顯的則是東南亞語言學習的熱潮。

以前台灣人學外語，以美語、日語為大宗，坊間補習班林立，各大學也有外文系或是日文系。然而，近年來，隨著東南亞經濟起飛，再加上東協起飛、美日語人才飽和等因素，使得東南亞語異軍突起，成為新興的熱門外語。

這樣的東南亞語熱潮隨處可見。除了教育部將在 107 學年度，新增東南亞語為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外的國小必選課程，2013 年已將東南亞語列為高中第二外語的選項。各大學也紛紛開設東南亞語言課程，暨南大學、高雄大學更

成立東南亞語學系。而政大則打算在明年度，將原有的東南亞語文學分學程改為學位學程，朝成立學系的目標邁進。



越南籍新移民陳鳳凰在台灣教越南語，已經超過 10 年，目前她在政大擔任越南語講師。一走進教學大樓，不用看指示牌，循著笑聲與整齊的越南語複誦聲，很快就找到陳鳳凰上課的教室。

星期六下午，教室裡坐了大約 30、40 名學生，看起來多半是上班族。大家認真地跟著陳鳳凰複誦一句又一句的「xin chào (您好)」、「cảm ơn (謝謝)」，那是該課程的第二堂課，學生生疏地練習著簡單的問候語。陳鳳凰則多次試著要與學生互動，課堂上不時傳來輕鬆的笑聲。

下課後，陳鳳凰不能馬上得空，不只有大排長龍的學生，拿著課本想要問她問題；更有兩名實習老師等著與她討論觀摩教學的狀況。距離下課時間約過了 20 分鐘，陳鳳凰才有空坐下來受訪。她說：「越來越多人想學越南文，這班人數也是超收。」

打開政大公企中心中心的網頁，可以看到越南、印尼、泰國語言都開了好幾個班級。陳鳳凰所開設的初級越南語，更是三個班都額滿停收，只能下期再報名。對比現在的東南亞語熱潮，陳鳳凰說，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第一次在政大上課，選課學生只有兩個人。」陳鳳凰笑說。她於 2005 年進入政大，擔任越南文講師。她永遠記得當時看到的選課人數只有「2」，但

在她的堅持之下，仍舊正常開課。正式開課後，到課人數增加為五人。除了兩名政大學生外，其他三名都是外校的旁聽生。



從那時起，選課人數開始出現變化。學生人數從個位數變成十幾個學生，再慢慢上升到 20、30 個。近年來，50 個選課人數更是常常額滿，今年甚至超收到 70 個學生。「其中有十個是想學越南語的新二代，我特別答應要保留名額給他們。」陳鳳鳳說。

相較於 10 年前開課的情形，陳鳳鳳說：「除了學生人數的差異外，學生的學習動機也不一樣。」她提到，最初學生學習的動機，多半是覺得越南文很少人學，選擇越南文當第二外語好像很酷。但現在，她說，大多學生都是帶有目的地來學習，多數學生都有意願到東南亞發展，或是即將被派到東南亞工作。「甚至有學生延畢，就是為了修完越南語課程，他覺得修完會更有競爭力。」她說。

「會東南亞語的人才非常搶手。」陳鳳鳳說。她提到，十年前選課的那兩名學生，從沒想過可以到東南亞發展。但在她的鼓勵之下，兩人畢業後都赴東南亞進修，現在在越南工作，年薪超過百萬。

新二代的南向體驗

印尼新二代張鈺惠早在南向列車啟動之前，就已經率先起跑。不只在

學時期，就為了畢業專題，獨自前往印尼做台商訪談。2003年，就讀中山大學碩士班二年級時，她更為了精進印尼文與完成碩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選擇前往印尼大學當交換學生。



張鈺惠回憶申請去印尼大學交換的過程時笑說，當時學校根本沒有去印尼大學交換的名額。她解釋，當時中山大學只跟印尼大學締結姐妹校，並未有訂定交換學生名額。從頭到尾都是她自己跟印尼大學聯絡，爭取交換的機會，才能一圓去印尼交換的夢想。但也因為她擔任了開路先鋒的角色，才讓學弟妹們有機會依循她的前例到印尼大學交換。

「交換那一年，我才真正體驗如何當一個印尼人。」這句話從六歲前都住在印尼的張鈺惠口中說出，讓人感到驚訝。

她解釋，自己從小就被以「華僑」的方式養著。直到交換時，有一堂口語課，老師正在教如何融入當地的溝通技巧，才讓她瞬間很有「印尼感」。不只是教語言，更是重新認識印尼的文化和人情。她舉例，對印尼人而言，殺價是一個樂趣，所以跟印尼人買東西，殺價一定要殺三次。她說，原價 100 元的東西要先砍到 50 元，老闆會再加到 90 元，這時要再繼續殺到 60 元，一來一往的攻防戰後，通常可以 60 或是 70 元成交。

另一個讓她感受到的文化差異，則是印尼人「愛問可是不想知道」這件事。她說，自己國高中時期，接觸西方文化較多，了解西方人重隱私；不論是話題或是身體距離，都是有很多界線。但印尼人不同，她說，印尼人聊天的開頭就

喜歡問對方家裡的狀況、關心生活瑣事。但他們不是真的想知道，所以不用認真回答；他們也不是要探聽隱私，只是想表達問候與關心。



在從那堂課裡，她也明白印尼人喜歡用肢體表達熱情。因此交談時，很容易有身體上的觸碰。從那時起，張鈺惠更有興趣觀察印尼的生活細節，學習如何當一個印尼人。

「我上大學以前，沒有搭過印尼的大眾運輸工具。」張鈺惠笑說。但她卻為了田野調查，獨自搭乘公車、火車甚至摩托計程車跑遍整個爪哇島做訪談。她說，為了訪問各地的台商，她常常要先搭火車到某個城市，再轉巴士到底站；最後再搭乘摩托計程車，才到達目的地。印尼交通的「塞」世界聞名，常常往返車程就要花掉她六小時以上的時間。但她用盡自己會的印尼文，幾乎走訪整個爪哇島。張鈺惠驕傲地說：「爪哇島的東南西北我都去過了！」

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張鈺惠說那時的東奔西跑是有價值的。她認為，在這份工作上，與其他競爭者相比，她所具有的優勢在於田野調查的經驗。張鈺惠目前在商業發展研究院擔任顧問，協助台灣廠商到東南亞投資。「像我這樣了解印尼的台灣人很少，也讓我求職大加分。」張鈺惠說。對她而言，跨文化溝通是她的優勢，她不只會印尼文，更了解當地的消費習慣、人文風俗，可以提供台商更精準的投資建議。

新二代優勢




不像台灣人要從頭開始學起，新二代的語言優勢可以說是贏在起跑點上。

除了張鈺惠外，另一個因為語言能力，而為求職加分的則是菲律賓新二代呂曉倩。擁有健康膚色、亮麗大眼的她，臉書上滿是拿著吉他自彈自唱的表演影片。她說，音樂夢是自己工作的動力。擔任樂團主唱的她，同時也是新北市勞工局的員工，負責處理移工的勞資糾紛。

呂曉倩說，自己會得到這工作機會，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她會說菲律賓語。她解釋，她的工作內容是接獲移工投訴後，前往解決勞資糾紛。然而，很多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中文能力並不足以描述糾紛情況，因此，懂東南亞語言的窗口就非常重要。她說，她的同事很多都是新移民配偶，只有她是唯一一個新二代。她提到，自己從小就會跟媽媽講菲律賓語，家中的電視節目也有菲律賓頻道。耳濡目染之下，培養了她的雙語能力。她認為，語言能力不只成為她的優勢，因為工作內容的關係，更可以幫助移工爭取權益，讓她非常有成就感。

「除了語言外，了解當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優勢。」印尼新二代何景榮強調。眼見台灣開始出現學習東南亞語言的熱潮，何景榮說，語言只是一項工具，若要真正到東南亞投資、工作，則要了解他們的消費習慣及文化風俗，掌握這些細節，才是成功的關鍵。

他提醒，若要跟印尼生意，則要注意他們受宗教信仰影響的消費習慣。印



尼是全球穆斯林的第一大國，接近九成的民眾都信仰伊斯蘭教，若只是急著將台灣生產的商品賣過去，則會碰到一鼻子灰。他舉例，台灣人常用的膠原蛋白，很多都是從豬身上萃取，但伊斯蘭教將豬視為穢物，根本賣不出去。又或是印尼人用的洗髮精也跟台灣人不同，台灣的洗髮精常強調保濕、滋潤，但伊斯蘭教的男性會戴著小帽，女性也會包著頭巾，頭皮幾乎一整天都悶在裡面。因此，他們都會購買強效的去油洗髮精。

他說，這些消費喜好和生活習慣，是他身為新二代特別有感的差異。在雙邊文化的適應與互動之下，他認為，新二代擁有最多資源和優勢，可以前進東南亞發展。

新二代難不「南」

除了新二代外，在台灣景氣低迷、薪資待遇不佳等大環境因素影響之下，東南亞似乎成為許多台灣人嚮往的「前（錢）」景。在新南向政策中，新二代被定位為「前進東南亞的領頭羊」，許多培訓、鼓勵性的政策內容，都是針對新二代，希望能鼓勵他們回媽媽母國發展。然而，新二代未必具備去東南亞發展的意願。除了語言不通外，文化隔閡、生活習慣等也是他們考慮的重點之一。

新南向政策似有意將東南亞尖兵的主力放在新二代身上，預期新二代皆為有母語能力、有跨文化適應條件，以及具有回東南亞發展的意願。然而，大家所視為理所當然的優勢，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渾然天成。當新二代被推上舞

台，披掛上戰袍，一夕間成為眾所期待的開路尖兵時，許多新二代的心聲卻是：「我沒有想要去啊！」



無論是語言上的隔閡或是異地文化的適應，對於從小就生長在台灣的新二代而言，也是待克服的問題。面對南向尖兵的期待，他們通常會露出疑惑或是尷尬的神情。彷彿在反問：「那是說我嗎？」像是印尼新二代徐政民，他幾乎不會說印尼話，對於印尼文化也不甚了解，更別說是回印尼發展。而另一名印尼新二代陳子琦，雖然從小在印尼長大，但她未來更想去歐美國家發展。

對新二代而言，另一個顧慮則是台灣的家人。「媽媽嫁來台灣，不得不與外婆分離，母女間的感情已經撕裂過一次。如果我再去越南工作，對媽媽而言，又是一種撕裂。」提到去東南亞發展的掙扎，越南新二代潘琳燕語重心長地說。

她表示，自己雖然有具有語言優勢，也有回越南發展的意願，但她卻捨不得與媽媽分開。她說：「除非媽媽跟著她一起到越南生活，不然她還是會選擇留在台灣。」

新南向後的新二代

「為什麼一定要『希望』我去哪裡發展？」這是印尼新二代劉依婷所拋出的疑問。



不論是即將上路的東南亞母語教育，或是新二代在新南向政策中的定位，面對政府所釋出的善意，劉依婷都打上大大的問號。台灣泰國文化暨語言交流協會秘書長洪銘謙也認為，過度將目光集中在新二代身上，無異是一種「雙重歧視」。以前將他們視為弱勢，現在又給予過高的期待，認為他們應該要會母語、並前往東南亞發展，無形間成為一種壓力。他還表示，過度強調「新二代」這個詞，反而會排擠他們融入台灣社會。

對於社會風氣與政策風向的轉變，劉依婷認為一切都很諷刺。「以前說我們是遲緩兒，現在又說我們是前進東南亞的尖兵，但他們口中的對象明明是同一群人。」她不以為意地說。她認為，近年來，尊重多元文化的意識抬頭，新南向政策也帶動社會對於新二代和東南亞的關注，改變以往的負面觀感。「但不應該是利益導向。」她堅持地說。

當政府將南向資源集中在新二代身上時，有些新二代認為這是他們的優勢，應該順勢搭上這班列車；但也有新二代認為，完全沒必要。會有這樣的差異，原因在於新二代是否有南進的動機。對於做足準備、有南進意願的新二代而言，現今的確是他們最好的機會。目前的他們，已經擔任起「橋樑」的角色，不論在經貿、文化或是教育的交流上，都為台灣與東南亞牽起連結。但也有新二代想留在台灣或是往其他國家發展。劉依婷爽朗地說：「我就是很喜歡台灣阿！」

全民的南向列車



「應該把機會給對東南亞有興趣的所有台灣人。」陳鳳鳳說。聽見新二代對於南進的掙扎與心聲，她認為，不應該強迫新二代一定要學媽媽的語言，或是回媽媽母國發展，應該以小孩的興趣為主。她主張：「不要因為新二代身份，而限制小孩發展的路。」

以她自己為例，她說，自己教越南文十幾年，卻從來沒有特別強迫兒女學習越南文。尤其是她的兒子對藝術、漫畫較有興趣，若是出國留學也會選擇前往日本發展。印尼籍新移民丁安妮也說，她女兒是十足的韓國粉絲，只要女兒有興趣，要學什麼語言或是去哪裡發展都可以。

在陳鳳鳳與蔡宇傑的教學經驗當中，絕大部分來學越南語的都是台灣人，雖然他們與東南亞並無血統上的關聯，但他們所展現出的熱誠與動力，完全不輸給新二代，甚至更積極想要南向發展。

台灣的南向人才，除了將目光聚焦在新二代外，還有更多台灣人希望得到這樣的機會，甚至比新二代更愛、更了解東南亞文化。

在大家眼中的林淑瑀是一個超級越南迷，身邊的好友都異口同聲地說：「她真的很喜歡越南。」被問到為何對越南情有獨鍾，她想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說：「可能國小時，第一次吃越南河粉就愛上越南了吧！」說完，她便哈哈大笑。

笑，彷彿這個理由太過簡單。




越南除了很對她的「胃」外，她國中時期，當大家都在迷韓國偶像、聽韓國歌曲時，她就在 Youtube 上開始聽越南歌曲。之後便迷上越南的偶像，會去他的粉絲專頁按讚，追蹤偶像的動態。

「結果竟然有越南人，來加我臉書好友。」林淑瑀說。從她的語氣聽來，到現在她仍舊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最後她也跟這些越南人變成好友。她說，越南人覺得很奇怪，一個台灣人怎麼會在越南偶像的粉絲專頁按讚，好奇之下就想跟她認識。最初雙方只能用簡單的英文溝通，後來林淑瑀開始買書、看電視自學越南文，到現在已經可以很流利的跟越南人溝通。

林淑瑀目前就讀暨大東南亞語系。她說，原本父母並未支持她選擇東南亞語系，進了東南亞語系後，她覺得如釋重負。她說：「我終於可以大方說自己喜歡越南了。」她提到，上大學前，每當有人知道她很喜歡越南，就會露出很疑惑、或是覺得她很奇怪的表情，常常讓她覺得不舒服。但在東南亞系，大家都有一樣的喜好，她感覺自己不再是「異類」。

除了大學科系讓林淑瑀感覺更自在外，她認為，近年來不論是東南亞的旅遊熱潮，或是政策的推展，都讓更多台灣人開始接觸東南亞文化。她提到，她爸媽也從原本的不看好，轉而認同這是將會是她的優勢。她也期待未來會有更多人，加入「哈越族」的行列。



南向列車所帶動的，不只是南進的熱潮與趨勢，更重要的是台灣人對於東南亞觀念上的轉變。學媽媽母語不再是影響新二代中文發音的主因，反而成為雙語優勢人才；喜歡東南亞文化也不會再被投以奇怪的目光，而是發現越來越多同好；大家開始編織「東南亞夢」，而不是美國夢。這些價值觀上的轉變，才是南向列車啟動後，新二代最有感的改變。

現在的南向列車上，不分台灣人、新二代，不論是語言進修、學術交流、經貿投資或是單純的文化熱愛，所有人都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張車票。火車行駛的方向，不再是美、日或中國，而是離台灣更近的東南亞。

第八章 我們不一樣 我們也一樣



「當環境安全了，新二代才能自在地說母語、做自己。」柬埔寨新移民林麗蟬說。

身為新二代的母親，以及台灣第一個新移民立委，林麗蟬不只為新移民配偶、移工爭取權益，更希望新二代能夠自信、自在地在台灣生活。

翻轉新二代標籤

「短時間內，新二代仍無法撕掉標籤。」林麗蟬說。她回憶著走在鄉間路上的印象，不論是水泥牆或是電線桿上，仍可以看到「越南新娘 20 萬」、「包娶到家」等斗大標語，與房屋買賣、水電修繕等廣告標語並排，彷彿她們的婚姻也是廣告中的商品。雖然內政部移民署早在 2008 年就規定，不得登刊跨國婚姻的媒合廣告，但林麗蟬說，這些加深跨國婚姻商品化、仲介化的負面宣傳，還是很難斬草除根。

「這些買賣標語，難道新二代看不到嗎？」身為新二代的媽媽，林麗蟬拋出不滿的疑問。接著無奈地說：「我們無法告訴他們，歧視已經消失了。」她認為，只要對媽媽的歧視還在，新二代的標籤就無法撕除。林麗蟬的看法是，既然無法根除歧視、撕掉標籤，就應該將標籤翻轉，讓新二代覺得自己是有優勢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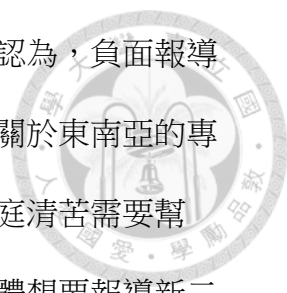
翻轉新二代的負面標籤是林麗蟬目前努力的方向。她認為，說母語、與外婆家的連結和擁有雙邊的文化，都是新二代在安全的環境下可以自然承襲的資產。以前媽媽不敢教母語，是因為怕小孩出去會被嘲笑、欺負，但當新移民、新二代感覺到台灣對東南亞是友善的、尊重的，甚至當大家都渴望成為南向人才時，這個標籤自然會翻轉。

針對近年來政府推出的新二代政策，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馮涵棣認為，語言傳承、文化連結應該都是自然產生的。只要氣氛對了，不需要透過母語教學、新二代福利等政策幫忙，新二代都會認同自己和媽媽的身份，就會產生自發性的親近與學習。

讓歧視消失

多數新二代認為，政府該做的除了政策上的推展外，更重要的是營造多元友善的氣氛，讓每個族裔都可以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他們的心聲是，不是每個新二代家庭都有經濟問題，經濟補助應該以家庭收入、而不是族裔身份作劃分；母語教育也不須急著在國小階段實施，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才是重點。

同時，有些新二代的目標是放眼世界，有些則想生根台灣，南向不是唯一的道路，讓歧視在台灣消失，才是他們最大的願望。



媒體的改變是新移民、新二代共同有感的進步象徵，他們認為，負面報導確實少了很多。雖然有越來越多關於新移民的正面報導，或是關於東南亞的專題介紹。但針對新二代的報導，還是落入制式的窠臼；不是家庭清苦需要幫助，就是得獎、考上好學校。越南新二代潘琳燕說，曾經有媒體想要報導新二代考上大學的事蹟，於是找上她幫忙，希望她的妹妹可以受訪，她卻一口拒絕。

她說她不懂，妹妹只是考上一般的公立大學，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事情，為什麼是新二代就要被放大？「我不想助長這種報導。」她無奈地說。

想要成為一個普通人，是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的心聲。他們不懂，自己明明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只是擁有不同國籍的爸媽，為什麼就不普通了？「我是台灣人。」是多數的新二代面對身份認同時，最優先的答案。

一個普通人

「我想寫一個普通的故事，不是表揚新移民十大傑出青年，也不是敘述那些可憐、堅強的孩子。」這是印尼新二代陳又津在《準台北人》一書中，寫下的話。

這段話出現在名為《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的附錄當中。雖說是附錄，篇幅卻幾乎佔了整本書的一半，內容是陳又津採訪新二代的訪談。



三重是陳又津從小成長的地方，也是《準台北人》中大部分故事發生的場景。《準台北人》寫的是她福建外省爸爸與印尼華僑媽媽，以及跟她一樣出生於1990年前的新二代。如同三重算不算是台北的疑問，她也反思自己的父母都從海的另一邊，來到台灣落地生根，他們或是她自己，算不算是台北人？在沒有找到更確切的答案以前，她認為，準台北人就是他們的最佳寫照。

關於新二代的身份，陳又津說，到研究所時期才意識到原來自己被叫做新二代。小時候的她，只知道自己有個不一樣的媽媽，常常把「我們印尼」、「我們客家人」掛在嘴邊。雖然她笑說，求學過程中她往往是班上話題的掌握者，可以隨時結束她不想討論的話題。但「盡量不要提到媽媽的身份」則是她在採訪新二代過程中，最有感的共鳴。

直到高中時，因為開始寫文章和小說，陳又津才注意到小說裡主角不會是爸爸上班族、媽媽家庭主婦的平凡角色，她才覺得自己的「特別」也是一件好事。有感於自己的特別，她決定要讓這樣的身分，成為小說的主角，於是開始尋找跟她一樣有外省爸爸與東南亞華僑媽媽的故事。

「我想寫以新二代為主角的小說，但我無法創造出共通的角色。」陳又津說出她在搜集小說素材過程中的困境。她提到，當她開始尋找故事時，很幸運地發現研究所班上，有兩個跟她有相似家庭背景的人，爸媽也是分別來自東南亞。但細聊成長過程發現，她歸納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麼共通點，才發現原來不是每個新二代都面臨一樣的問題，或是擁有一樣的生活經驗。於是她暫時放棄

了以新二代為小說主角的念頭，轉而將這些不一樣的故事寫出來，成為《準台北人》書後的附錄：〈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



在她的筆下，新二代不再是「大好/大壞」的二分法，沒有家境清寒、學習遲緩等悲慘故事；也沒有光耀門楣、成為傑出青年等優秀事蹟。她說，新二代身份對於她成長過程中的影響很小，沒有被欺負、也沒有任何光環。她只想寫一個跟自己一樣「普通」的故事。

回顧新二代的成長經歷，多數人跟陳又津同感，以「我」而不是「新二代」的身份，跟著所有人一起長大。除了因為遲緩兒、社會問題、南向尖兵等議題受到注意到外，「普通」是他們最真實不過的面貌。新二代不只是學者的研究對象或是新聞報導的受訪者，他們也是班上同學、隔壁鄰居、餐廳服務生或是一個在等公車的高中生，他們無法被歸納也無法被延伸去同一個地方。他們是普通但又獨立、獨特的個體，就跟每一個台灣人一樣。

我是新二代

根據內政部資料，2015年，在台灣的新二代人數已突破35萬人。從20、30年前跨國婚姻萌芽開始，這群新二代已經逐漸長大，由家庭走向學校，由學校走入社會，甚至已經進入婚姻。目前新二代在國中、國小總人數已超過20萬人，如台北市中正區忠義國小、新北市新莊區福營國中等，新二代比例都超過30%。在這些學校的老師眼中，新二代就只是普通的學生。福營國中老師王翊

亘就說，學校雖然調查學生的新二代身份，對她而言，那就像學生的血型一樣，是一種不帶優劣的分類。




隨著新二代人數逐漸攀升，班級裡的新二代學生成為常態，再加上社會風氣的改善，讓那條寫著「差異」的界線也逐漸模糊了。

印尼新二代徐樺姿在大三暑假，獨自一人帶著一台摺疊腳踏車，利用火車環島，踏上尋找 101 個新台灣之子的路。她的計畫目標是希望在三個月內，到全台灣尋找 101 個跟她一樣的新二代，並用影像記錄他們用媽媽的母語，說出「媽媽，我愛你。」的全景。

談到計畫的起源，徐樺姿說：「以前我很排斥自己的身份，我不希望現在的新二代也這樣。」然而，當她跟別人提起她的計畫時，眾人總是先是驚訝，再來則是勸退。認為身形嬌瘦的她，要怎麼利用單車與火車環島。最不被眾人看好的則是如何找到 101 個新二代，他們總是皺著眉頭懷疑：「哪有這麼多願意配合的新二代？」

面對眾人的勸退與不看好，徐樺姿從來沒有害怕過。她笑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有勇氣和預感，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完成。」唯一讓她擔心的，是新二代是否會跟她一樣排斥說母語、排斥承認自己的身份。

開始踏上尋找之路後，她才知道自己的擔心都是多慮。她走入鄰里、走進國小，當她與新二代或是他們的媽媽提出計畫時，發現現在的新二代都非常大



方、自在地看待自己的身份。她說，幾乎每個新二代都同意拍攝，新移民媽媽也都樂意讓小孩參加。其中，讓她印象最深刻則是高雄旗津的中州國小，學校主任在得知她的計畫後，不但欣然配合，更主動幫忙發放家長同意書。在多方努力之下，參與的新二代人數達 40 多人，幾乎全校的新二代都參與了徐樺姿的計畫。最後，她超出眾人期待，找到了 105 個新台灣之子。

提到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徐樺姿說，她遇到的新二代中，只有一個會講印尼語，其餘的幾乎不會講媽媽的母語。經由她的指導，或是請他們問媽媽後，才順利完成此計畫。在她的鏡頭下，她說：「很多新移民媽媽都是第一次聽到小孩講她的母語，當她們聽到小孩說『媽媽我愛你』時，都非常感動。」而她也利用這個機會，用印尼語跟媽媽說了我愛你。回想起媽媽當時的神情，她露出滿意的微笑說：「我媽媽也很感動。」

圓滿達成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後，讓徐樺姿深感欣慰的是，新二代不再躲藏。當她走入國小教室，詢問班上有誰是新二代時，小朋友都開心、毫不猶豫地舉起手說：「我我我！」那種熱烈的程度是她無法想像的。

不一樣也一樣

不只是現在的國小新二代已經可以自信、大方的看待自己的身份，許多遭遇過偏見與歧視的新二代們，也已經走出當初的陰霾。泰國新二代張辰嘉就是一個例子。現在的他不只為自己的身份而驕傲，更希望利用攻讀研究所的機

會，在學術上關注少數族群、東南亞等相關議題。




回頭看看曾經困在自卑中的自己，他反而慶幸自己的新二代身份。他說，不論是經濟或是身份認同上，他都走得比別人辛苦。但也因為他走在一條充滿荊棘的路上，才促使他不斷激勵自己，讓原本不看好他的人都跌破眼鏡。「活得比別人辛苦，但得到的也比別人多。」是張辰嘉一路走來最想告訴自己的話。

「對於身份認同，我不會再這麼混亂，或是一定要定義自己是誰。」他說。他認為，當初對於身份認同的混亂，是因為不瞭解所以排斥。因此，除了學術上的研究外，他也開始關心泰國的文化、政治和歷史，甚至獨自前往泰國旅行，走遍曼谷和大小離島，體驗當一個泰國人的感受。現在的他，不只接納自己的身份，更為身為一半的泰國人而驕傲。

相較於十幾二十年前的環境，那些從搖籃走入社會的新二代，多數已經超過 20 歲。他們共同經歷過「你媽媽是買來的」、「你是遲緩兒」等最不友善的時代，到現在的雙語優勢、南向人才、多元文化教育，以及新二代小朋友大方認同自我的新氣象。雖然還不是最好的時代，他們都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

然而，在部分成年的新二代中心，「新二代」這個詞彙，多少還是影射了負面的印象。他們雖然不再隱藏身份，但在「新二代」的框架下，他們似乎被定型，成為由社會刻板印象形塑的新二代樣貌。然而，真正的他們就像每一個生活在台灣的人一樣，普通但是獨特。如陳又津所言：「多數時候只想撕下新二代標籤，做自己就好。」



此刻，當台灣的新二代人數越來越多、社會大眾也逐漸調整心態後，界線彷彿正在消失中。未來，新二代或許還是一種方便的分類標準，只是，當人們使用這個名詞時，已能意識到這個名稱背後，曾經印刻數十年標籤翻轉的心路歷程。

他們也是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也都一樣。





〈報導企劃〉



第一章 報導動機



第一節、台灣的新移民與新二代

隨著東協熱潮以及新南向政策的啟動，新移（住）民¹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²）這在兩三年內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一夕間，新二代已經從搖籃裡的嬰兒，逐漸成長為走入校園、走入社會的成年人。當媒體關注的目光，由新移民一代轉移到新移民二代身上時，關於新二代的家庭環境、學習、身份認同等問題也一一浮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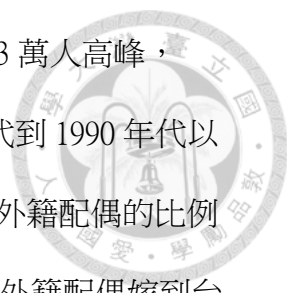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6）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原屬國籍分統計資料，到2015年為止，台灣地區的東南亞外籍配偶人數累積約13萬人，大陸地區配偶則約28萬人³。總計超過40萬的新移民配偶支撐住台灣的勞動力及生育結構，人數也已超越原住民族，成為台灣的第四大族群。但台灣社會對於他們的接納和多元文化的理解，似乎沒有因為新移民配偶在台灣人數的成長，或是在台灣的時間變長而成正比提升。

歸納近20年內新移民配偶來台灣趨勢，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6）縣市結婚按性別及原屬國籍統計，自1998年到2015年期間，每年約有1萬5000名大

¹根據內政部移民法定義，新住民為持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者，申請入境停留、居留及定居之新移民。本報導的新移民，指的是東南亞籍配偶。

²根據內政部定義，新移民子女是指「子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本報導的新二代，則是指東南亞配偶與台灣籍配偶所生的小孩。

³統計人數皆包含已入籍或是離婚的新移民配偶，以原屬國籍做為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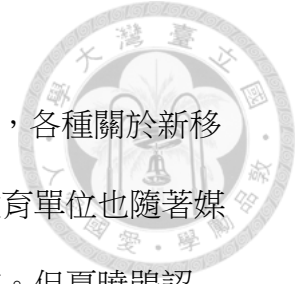


陸地區配偶嫁到台灣，從 1998 年開始逐年遞增，在 2003 年達 3 萬人高峰，2008 年後人數趨減，2014 年首度低於一萬人。另，自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以來，由於台灣與東南亞的經貿交流日益密切，也帶動東南亞籍外籍配偶的比例逐漸攀升。自 2001 年到 2015 年，平均每年有 8400 名東南亞籍外籍配偶嫁到台灣，2005 年以前每年有超過一萬人次。但自 2005 年開始，為杜絕假結婚，外交部開始對外籍配偶實施境外訪談，內政部也以個別面談替代原本的集體面談，影響東南亞籍外籍配偶來台人數，每年約 5000 人左右。

外籍配偶人數雖多，來台後不僅面臨生活及文化適應上的挑戰，更要面對夫家傳宗接代的壓力。內政部（2003）「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摘要報告」提到，受訪的外籍配偶超過九成為東南亞籍，其中，近七成與台灣配偶生育子女，大陸配偶則有五成生育子女，有生育者平均每人生育 1.5 個子女。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6）「出生數按生母原屬國籍分（按發生日期）」統計資料，在 2004 年到 2007 年間，生母原國籍為東南亞或大陸地區的新二代人數，佔總出生人數超過 10%，在 2008 到 2015 年間，平均佔總出生人數的 7.6%。而從 2004 到 2015 年，這 12 年間出生的新二代人數已經超過 21 萬人，使得新二代成為台灣重要的人口結構。

第二節、新二代仍遭污名化

「媽媽我是哪裡人？越南人還是台灣人，我是不是比我同學笨？」大約二十年前，越南籍的林金惠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一書中，寫出他兒子童言童語的提問，並接著寫下：「有時候連自己也會有問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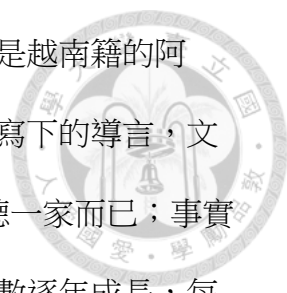


夏曉鶻（2005）在書中提到，隨著「新台灣之子」的增加，各種關於新移民二代發展遲緩、發展能力較低的報導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教育單位也隨著媒體風向，紛紛提出解決方案，避免這些孩子拉低台灣人口素質。但夏曉鶻認為，媒體在報導發展遲緩、學習表現落後等新二代的「問題」，缺乏紮實的研究基礎，其彰而未顯的假設是「人種品質論」。

在生育率低迷的台灣，從民間到政府都在鼓吹「增產報國」，希望台灣女性可以多生孩子。但在 2004 年，前教育部常務次長周燦德，卻在公開場合道德勸說外籍和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多！」藍佩嘉（2004）也提到，前監察委員李伸一、黃煌雄曾提出糾正案，要求行政院建立明確的移民制度和有效的獎勵機制，以解決移民人口結構兩極化的趨勢——「優秀高素質青壯國人快速外移、低素質外籍配偶、外勞又大量流入」，因為他們擔憂：「台灣國力正快速流失中」。而在 2006 年，前聯立委廖本煙也說出「越南新娘身上有越戰生化餘毒」、「外籍配偶生不出好小孩」等歧視性言語。

隨著新二代人數的增加，大家的目光焦點也落在他們身上，然而，新移民配偶的國籍似乎成為這些年輕母親的原罪。在媒體報導，甚至部分高官、學者眼中，新移民配偶總是與逃婚、假結婚、家暴等負面標籤連結，被視為台灣急欲解決的「社會問題」（夏曉鶻，2001）。但如果新二代的母親被視為「社會問題」，那麼新二代是否仍舊是待被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媒體的報導或是政府的態度當中，新二代似乎沒有完全擺脫新移民母親



所被烙印的「問題」。「小婷、小霖都是嚴重的遲緩兒，母親則是越南籍的阿源。」這是《時報週刊》記者在〈外籍媽媽遲緩兒〉報導中所寫下的導言，文中寫道：「這些新台灣之子，成為遲緩兒的案例，並非只有阿德一家而已；事實上，新台灣之子已經成為遲緩兒的高危險群，隨著外籍新娘人數逐年成長，每年台灣遲緩兒的通報人數也暴增許多。」（陳逸思，2004）這樣的標題和報導內容，無疑是將新移民配偶及新二代貼上遲緩基因的標籤。

而在《天下雜誌》〈我不笨，我只要求公平對待〉的報導中，則寫出了政府官員對於新二代的刻板印象。林照真（2004）寫到，台北市教育局在 2003 年進行有關「大陸及外籍子女學校適應狀況的調查」，適應良好者佔 61.89%，表現不好者則為 38.11%，但新聞稿卻只提到新二代學業與生活適應欠佳的狀況，而沒有說明適應良好者佔多數。她指出，部分關於新二代「學習遲緩」的研究，不只樣本數過少，也沒有經過大規模的長期研究，反而造成過度推論，更加弱化新移民及新二代的形象。

雖然後來的許多研究都為新二代的學習能力平反，但「新二代學習遲緩」、「新二代學習表現差」等觀念已經先入為主在部份台灣人心中，在社會觀感上，仍舊對新二代媽媽國籍所造成的學習影響抱持疑慮。如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主任李美賢（2015 年 4 月 16 日）提到，在東南亞學系成立之際，有單位要提供新二代獎學金，原因則是「新二代的媽媽來自發展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因此比較弱勢。」她認為，即使為新二代、新移民配偶平反的研究再多，也很難改變既有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因此，本深度報導即希望透過新二代的真實案例，了解他們在求學過程遭遇的各種情形，期能藉由他們的自述，讓新二代的學習表現不再只是研究報告中的數字。甚至可以具體呈現背後的原因，讓結構性問題得以被面對。



新二代除了因為媽媽的國籍，被質疑學習能力落後之外，其他因為用歧視性語言批評新移民配偶或是新二代的新聞時有所聞。2010年，一名國中老師對著媽媽為印尼籍配偶的新二代說出：「野蠻人，跟著媽媽滾回印尼去！」並質疑她成績進步是因為作弊的關係，造成該名新二代多次割腕自殘（林錫淵，2010年1月12日）。2012年，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則認為：「新移民子女若沒有政府的協助，恐成為犯罪來源。」這些言論不但揭露出台灣人傲慢的種族偏見，將新移民配偶視為落後、野蠻且有犯罪傾向的族群。

而在2015年的「性別平等 台北發聲－性別議題公共論壇」活動後，各家媒體爭相報導台北市長柯文哲失言說出：「台灣不是很多外籍新娘嗎？已經進口30萬了（顧荃，2015年3月8日）。」這一席「外配進口說」，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各方批評聲浪不斷，在公民團體的抗議之下，柯文哲最後道歉並承認失言。

「外籍新娘」一詞，在2003年就由多個團體要求正名為「新移民女性」；2008年《入出國及移民法》也增修反歧視條文：「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但直到2012年，時任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才承諾要將外籍配偶正名為「新住民」。但在2015年的高中地理科課綱中，相關團體嚴正抗議仍在使

用「外籍新娘」一詞，更加入「菲傭」、「印傭」等歧視性字眼，涉嫌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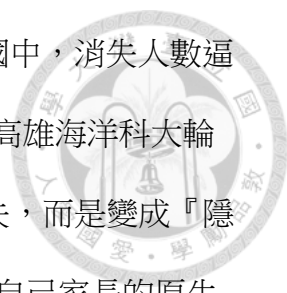
經由柯文哲的失言風波，可以了解刻板印象很難因為政策而改變。年僅 12 歲的新二代小勳表示，柯市長怎麼會把「進口」二字用在人身上呢？他應該要去思考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她更質疑，柯文哲平時有沒有關心移民議題和移民處境？「要不然他就會知道，我們的媽媽不喜歡被叫外籍新娘，現在也沒有人再叫外籍新娘了。」(邱雅青、李佩香、周憶如，2015 年 3 月 9 日)。

由前述幾個例子中可知，這幾十年來，雖然政策、法令或是社會風氣對於新移民配偶的歧視和偏見都有改善，卻難以根除，而這些背負在新移民配偶上的包袱，更可能由他們的子女繼續承擔。

第三節、書寫新移民二代破除污名

距離《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出版已經超過十年，新移民在台灣人數早已超過 50 萬人。這些新移民配偶的小孩已經從搖籃走向學校甚至走入社會，根據教育部 103 學年度「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103 學年就讀國小及國中的新二代學生數超過 21 萬人。而從 2004 年到 2014 年間，新二代占國中小學生數的比例更是從 1.6% 增加至 10.3%。

王彩鸞（2015 年 2 月 22 日）報導，根據教育部資料，2014 年，有 2 萬



6717 名新二代學生從國小畢業，但同年只有 2 萬 1630 人升上國中，消失人數逼近 6000 人，等於消失了超過五分之一的新二代。接受訪問的高雄海洋科大輪機工程系教授俞克維說：「新住民子女就學人數，應該沒有消失，而是變成『隱藏版』了。」他解釋，新住民子女在轉換學籍時，可能會隱藏自己家長的原生國籍，這種現象也會發生在國中升高中的階段。教育部統計處國民及學前教育統計科科長陳淑華表示，教育部會發文給各級學校統計新二代人數，由學校代為統計，但不會強制要求新二代表明媽媽的原生國籍，尊重學生個人意願。她提到新二代學生人數在升學階段的減少，除了有部份新二代可能選擇隱瞞媽媽身份外，也有學生是出國求學或是暫停學業。

然而，這 6000 名新二代為何要隱藏？是否想藉由學籍轉換過程，脫下媽媽的國籍包袱？其他表明媽媽國籍的新二代，又會面臨哪些問題？是什麼樣的情形讓六千人不想如此？他們是怎麼帶著什麼樣的包袱生活？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完整解答，媒體對於新二代新聞的追逐，經常僅止於低度呈現或是配合政府相關政策的報導。主流媒體在報導新二代相關新聞時，往往都是主觀詮釋新聞，鮮少直接訪問新二代。因為這樣，本深度報導論文也希望透過訪問，了解新二代的求學過程中，是否有因為其身份而受到特別關注或是歧視，讓他們選擇隱藏。此外，本深度報導論文也想了解，他們在與同儕相處過程中，又經歷了怎樣的身份認同轉折。本深度報導論文也希望透過報導，了解新二代在求學過程中真正需要的政策協助。

其實，主流媒體在更早時候報導新移民相關新聞時，不時有「放大偏差」的情形發生，如：「假結婚、真賣淫」、「拐騙夫家財產」或是「落跑新娘」等負

面消息，使得報導受到扭曲、誇大與象徵化，也因此讓這些負面標籤和刻板印象，化約為台灣民眾對於新移民的速記線索。社會大眾透過刻板印象，將新移民配偶「簡化」和「標籤化」，形成一種片面、窄化及概論化的形象，這過程之中必然會形成「偏見」甚至「歧視」（張錦華，2014）。

有鑒於新移民難以在主流媒體擁有對等發聲的機會，身為新移民第一代的外籍配偶，開始主動書寫或是說出自己的故事，陸續出版了《別再叫我外籍新娘》、《牽手萬里—傾聽外籍配偶的故事》、《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等書籍。越南籍的紀錄片導演阮金紅，更拍攝了台灣第一部以新移民視角呈現跨國婚姻的紀錄片《失婚記》。不論是文字或是影像，透過深入的瞭解和參與，完整呈現新移民的故事，不再讓他們的自我價值消失在主流媒體的再現當中。

然而，他們的子女一新二代，卻少有機會可以講出自己的故事，他們在媒體上的露出多是感謝辛苦打拚的新移民媽媽：

「從小媽媽背著我到處工作，非常辛苦，現在我長大了，想趕快賺錢買電梯大樓給媽媽住，膝蓋不好的她就不必再一直爬樓梯了。」

東海高中餐館系學生林均霈和單親越南籍媽媽吳靜幸相依為命，媽媽年輕時背著均霈到處工作，加上長期蹲跪，現在每天回家要爬六層樓非常吃力（李昭安，2015年7月25日）。

一名來台20年的印尼籍甘菲玲(40歲)，12年前與開計程車丈夫共

組家庭。婚後不久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原本 4 口之家幸福美滿。……兩女兒吳怡霈、吳怡萱貼心說：「媽媽身兼父職，一天工作 14 小時，上午在早餐點，下午要到永和去幫人打掃，分上兩個班，媽媽那麼辛苦，就是為了要把我們撫養長大（曾伯愷，2015 年 5 月 9 日）。」



直到 2015 年，相繼由《聯合報》、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及獨立評論@天下等單位發起，開啟「新二代書寫運動」。然而，這些報導，雖然是由新二代們親身陳述，讓我們看到他們不為人知的故事，但是對於新二代整體「族群」共同所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卻沒有針對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如種族、階級、性別等，進行探討和分析。因此，本深度報導論文希望找出新二代們在成長經歷中的連結性和共通性，試圖了解他們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如何對他們造成壓迫，這些問題都是本深度報導論文想要了解的面向。

結構性問題所帶來的壓迫，雖然一時間無法解決。相較之下，政策成為影響新二代權益的重要保障，也是引領社會風氣和媒體風向的重要依據，會間接影響到台灣社會對於新二代的評價和看法。眼見新二代人數的快速增長，政府在 2015 年將外配基金更名為「新住民發展基金」，希望將原外配基金所照顧的新移民第一代，擴大到對新二代的保障。之後也陸續有「新住民第二代培力計畫」、「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以及引發廣泛重視的「新南向計畫」，可看出政府的新二代政策正逐漸從消極轉為積極，鼓勵新二代學習媽媽母國的語言與文

化。



然而，本深度報導論文也想了解，新二代的處境跟政府政策的方向是否有所關連，當政府投入資源，積極將新二代的形象建立為「前進東南亞的領頭羊」時，新二代是否受惠？對於他們自身的認同又有何幫助？而這樣的政策方向是否能夠幫助解決新二代所面臨的種族、階級等結構性問題，如果無助於解決新二代的問題，那麼他們真正需要的幫助又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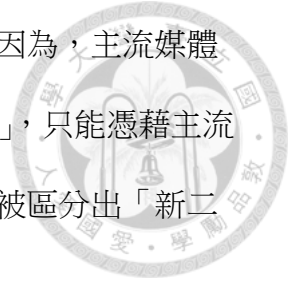
第四節、預期報導方向

關於新移民女性的研究，不論是質化或是量化都已經有一定的數量和成果，然而，針對新移民子女的研究多數集中在探討其學習狀況、學校適應情形等等，少有針對他們生命歷程的質化研究或是深度報導，無助於解決新二代所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無法勾勒出新二代族群的共同性與連結性。

新移民女性嫁來台灣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時間，透過他們自身的發聲運動，讓社會了解他們的故事，避免因不瞭解而產生的誤會，不論是文字或是影像，都非常感動人心。但新二代故事卻停留在新移民媽媽的故事中，多數角色都是會幫忙做家事、照顧弟妹、當選模範生或是成績優異的乖小孩。然而，在其他時間、其他場域，他們的故事角色又是如何？他們又是怎麼說自己媽媽的故事？

本深度報導論文希望藉由報導，深入了解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的生命故

事，包括自我認同、對母親的認同以及對社會態度的感知等。因為，主流媒體一直用「他者」的眼光去看待新二代，卻忘記他們也是「我們」，只能憑藉主流媒體所塑造出的形象去想像他們的生活，或是因為政府政策而被區分出「新二代／非新二代」。



新移民是台灣的第四大族群，新二代也將成為台灣人口結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其中有些已經長大成人，他們走進學校和社會，母親來自東南亞的事實，也陪伴他們長大。然而，在整體社會結構的壓迫之下，不論是新移民配偶或是新二代，多數的他們都曾經面臨種種歧視或是不公平的待遇，因此，除了報導新二代更多元的成長故事外，也希望藉由他們的故事，拼湊出新二代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和困境，梳理出這些問題與偏見，對他們的成長經歷或自我認同造成什麼影響，讓台灣社會能夠正視新二代與新移民配偶所承受的歧視與偏見。

讓新二代呈現更多元的面貌，是本深度報導的初衷。本報導雖無法完整呈現所有新二代的面貌，或許有部分新二代仍選擇隱藏身份；或許有不同地區、教育或是家庭狀況的新二代，無法一一呈現。本深度報導透過這些願意站出來分享成長經驗的新二代，終於可以窺見他們真實的一面。透過本深度報導論文，希望有社會可以聽見，更多元的新二代聲音。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種族主義下的新移民配偶

新二代的媽媽們從東南亞、中國大陸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她們的到來，看似是符合全球化潮流的國際遷移，並促成了地球村的形成，但是在這個地球村之中，權力似乎沒有那麼平等均值。因為在這其中，有些人擁有較多的管道和能力，可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主動選擇往機會較好的地方流動；但有些人卻迫於經濟、父權壓力，無法表達自己的移動意願，只能被動地接受別人的移動（藍佩嘉，2012）。而分析在台灣的大陸及東南亞婚姻移民，根據夏曉鵬（2002）的研究指出，在工業化及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之下，台灣農村、漁村逐漸凋零，使得這些農、漁村男子被排擠在主流社會「好對象」的條件之外，很難吸引台灣女性，成為婚姻市場中的弱勢，衍生出商品化買賣婚姻的需求。除了經濟因素外，田晶瑩、王仁宏（2006）指出，「男性氣魄」更是影響買賣婚姻的原因之一。他們表示，相較於台灣女性，娶東南亞配偶更可以彰顯台灣男性的氣魄。因為在台灣人眼中，新移民總是與順從、依賴、低自主性、低物質需求劃上等號。然而，這樣的等號卻也反過來堆疊出新移民的「婦德想

像」。雖然根據王宏仁（2001）的研究，這些娶新移民配偶的台灣男子，不論從教育背景、職業聲望、居住區域而言，都是比較弱勢的一群。但在經濟環境的考量之下，台灣也成為這些婚姻移民的選擇之地，形成階層化世界體系的跨國流動中，所謂的「空間上嫁」（*spatial hypergamy*）（藍佩嘉，2012）。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之下，新移民配偶再嫁來台灣之前，就已經因為母國的形象，而被貼上經濟弱勢、來台淘金、買賣婚姻等負面標籤。再加上他們夫家大部分也是屬於台灣經濟、社會聲望中的弱勢，更難為自己的妻子發聲，或是扭轉她們的形象。即使如今新移民配偶在台灣人數超過 40 萬人（內政部，2016），縱使大部分的新移民配偶已經成為「台灣人的媽媽」，他們與台灣丈夫所生的新二代，在國小比例也已超過 10%（教育部，2014），但新移民配偶在台灣社會仍被標示為「非我族類」，以種族、血緣之分，使他們難以真正融入「台灣人」之列，並以種族作為分類的依據，讓她們背負低階種族的污名，將後天的地位予以本質化和自然化，以合理化主流社會對於新移民配偶的種種歧視和壓迫。

藍佩嘉（2005）提到，「種族化」是標示（*mark*）出某一群體，在生物或是文化上的不同，使得族群間的差異被本質化和自然化，並被貶抑為主流社會外的「他者」。若「他者」的文化、歷史被視為有親近性，則該群體可以變成「我們」的一部份；反之，則被視為難以同化的「永恆他者」。然而，在 20 世紀後期，學界普遍質疑「種族」作為人種分類的正確性，並指出膚色、輪廓等外在的差異，並不是互斥的類別，而是一種連續性分布的差異，簡言之，人類在生物分類上的本質相同，並無膚色、種族之分，因此，種族是被社會所「建

構」出的分類，由社會「賦予意義」，而非自然存在。



然而，在台灣的新移民配偶，不論是來自東南亞的配偶，或是種族、語言、文化都與台灣人相近的東南亞華僑配偶及中國大陸配偶，即使她們在台灣生活已經超過二十年，在台灣早已落地生根，也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拿到了台灣身分證，但被仍被視為「他者」。法國政治哲學家 Etienne Balibar (1991) 將這種對於移民歧視稱之為「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out race)，因為主流社會歧視、排擠移民的行為，並不是出自於外表、膚色等生物分類上的「種族」，而是將種族間的文化差異視為自然本質，合理化主流社會的歧視本質 (藍佩嘉，2005)。在這樣的種族主義之下，不只新移民配偶要真正融入台灣社會，仍舊充滿重重阻礙，對於新二代而言，也將與媽媽一同背負著種族主義的包袱。

第二節、新二代的媽媽 = 「社會問題」？

如第一章所提到，不論是 20 年前或是 20 年後的現在，社會及媒體甚至政府官員，對於新移民配偶的歧視狀況都未消失，在台灣提倡多元文化的同時，是否又能真正尊重並理解新移民配偶母國的文化？夏曉鵬 (2000) 認為，台灣社會所認知的外籍配偶都是來自於東南亞地區，並與台灣男子結婚的女子。在台灣媒體的報導之中，總是將她們化約為沒受過高等教育以及來自貧困家庭的刻板印象，而她們的結婚對象也是在台灣無法娶得妻子的人。這樣的婚姻關係往往被簡化為「買賣婚姻」的印象，強化了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負面印象，成為台灣的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夏曉鵬（2001）提到，台灣媒體的論述偏向將外籍配偶定調為「社會問題」，並充滿對東南亞配偶的刻板印象和歧視，例如：賣淫、破碎家庭、低學歷低素質人口、苦命認命的受害者、為錢賣身的淘金者等等。這些用來形容新移民配偶的負面標籤，不只影響台灣社會對於她們的觀感，甚至會影響政府政策的方向。如現行的《國籍法》中，新移民配偶若要申請歸化，必須符合「品行端正」的要求，任何「違反善良風俗」的新移民都不得歸化。民進黨立委 Kolas Yotaka 就直指該條文涉及種族和性別歧視；民進黨立委尤美女也認為政府把新移民當作「聖人」在檢視，罔顧她們的權利（蕭長展，2016年4月18日）。

田仁傑（2007）認為，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配偶的想像，就是來自於「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不止骯髒、懶惰，且教育程度低、人口素質差，如此的「基因決定論」就是血淋淋的偏見與歧視。而這樣充滿歧視性的言論也讓新移民配偶們，飽受歧視與污名。根據他歸納眾學者對於「仇恨性言論（hate speech）」的定義，整理出三項「仇恨性言論」的特徵，包含了：「言論」、「針對個人隸屬於某種群體的身分或該群體本身」以及「具有侵犯性」。他認為，歧視性言論是針對某種「身份」發表具有「侵犯性」的評價或是描述，且不只是關係到受歧視性言論所侵犯的當事人，更是對當事人的種族、身份等所屬「特定群體」有所侵犯。

新移民配偶在台灣原本就處於被結構所宰制的弱勢地位，再加上媒體、社會大眾甚至是政策上對他們的歧視性言論，使得他們負面、污名化的形象不斷被建構，主流社會也習慣了這樣的不對等權力關係，讓新移民配偶更難為自己

發聲。這樣的歧視，除了對新移民配偶本身以及新二代會造成傷害外，主流社會更是將言論化為壓迫的工具，再次複製了種族歧視以及種族壓迫，將他們排除於主流社會以外，成為弱勢的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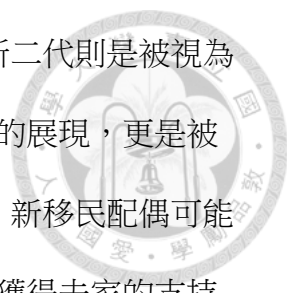
田仁傑（2007）認為，主流社會對於新移民配偶的偏見和歧視就是隱藏的「種族主義」，因為他們不符合「全球種族次序」（global race hierarchy），否則當台灣人與歐美人士所生的小孩，為何不會被大肆報導「中文學習遲緩」，反而會被稱讚「外語能力優秀」，無疑是因為主流社會將新移民配偶定義為「種族劣等」，表現出不對等的種族歧視。廖元豪（2006）同樣認為，現今的移民法規和政策，充斥著本土種族主義的色彩，把不符合「全球種族次序」的新移民當作入侵者，視為應該拒絕和限制的族群。曾嫻芬（2006）的研究也指出，近年來，移民政策是建立在「人口素質」篩選的階級主義之上，將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配偶，視為降低台灣的人口素質的「低階移民」。且如果當政策的正當性，越來越建立在階級主義之上，同時浮現的是有階級意味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 classes）。

Richard Delgado（1982）表示，受到歧視性言論影響的少數族群，在心理上會漸漸相信主流社會所建構的族群負面形象，長期飽受歧視性言論的少數族群，會選擇討厭自己（to hate one's self），或者忘卻自己（to have no self）。在種族歧視言論的包圍之下，少數族群會開始因為主流社會的歧視性言論而否定自己，不只不利於他們與自己種族或是其他種族建立關係，長期下來，他們更會害怕挑戰多數霸權，只能接受自己身為他者的事實。廖元豪（2006）認為，歧視性的語言會造成少數族裔在生理、心理與公民權利上的傷害，甚至會影響

他們教養的子女的能力，進而造成下一代的失敗主義心理。對此，Richard Delgado（1982）也特別提到，當受害者為孩童時，這樣的歧視性言論會被放大，因為他們更不具有反抗能力，也無法意識到自己是因為權力結構關係，而受到壓迫的受害者，反而會將受歧視原因歸咎於自己本身，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轉引自田仁傑，2007）。

第三節、從新移民配偶到新二代的壓迫與歧視

從台灣社會對於新二代母親的種種歧視性壓迫，可以看出新移民配偶在台灣社會的弱勢性地位，不止會影響新移民配偶對於自身的認同，也會影響新二代對於他們自身的認同以及對母親的認同態度。藍佩嘉（2012）指出，不論是媒體、社會甚至是政府官員，都會因為新二代母親的身份而為他們貼上「發育遲緩」、「不良基因」等，帶有嚴重歧視的標籤，這些言論所代表的想像，是將台灣社會視為同質、優良、乾淨的基因庫，反之，新移民配偶則被視為「教育水準低落」、「骯髒懶惰」的外來低劣種族，唯恐他們破壞了台灣人的優良品種，生下「血統較差」的台灣之子。在這樣的種族主義之下，新移民配偶的母國語言及文化，不被台灣所重視，遠不如歐美混血小孩的「雙語優勢」，反而成為新二代的「負資產」。如徐榮崇、徐瑞囊（2007）所言，若台灣社會將新移民配偶視為多元文化的輸入者，新二代則可以承襲父母，學習雙邊的語言及文化，成為他們的優勢所在；反之，若是將新移民配偶視為低階文化的輸入者，則會讓新二代的身份成為小孩的包袱。



在台灣，新二代的媽媽被視為文化、種族外的「他者」，新二代則是被視為延續「他者」種族、文化的危機，不但無法被理解為多元文化的展現，更是被渲染為整體社會的風險與危機（趙彥寧，2004）。在家庭之中，新移民配偶可能會面對夫家歧視的眼光，認為他們是來騙錢、水準低落，無法獲得夫家的支持與尊重。莫藜藜、賴珮玲（2004）指出，新二代長期目睹自己媽媽遭受社會及其他家人不公平的對待和歧視，內心會產生諸多迷惘、衝突與矛盾。他們害怕自己站媽媽這邊，會被一同歸類為弱勢族群，但站在父親家人或是主流社會這一端，又會害怕成為歧視媽媽的一員。在這樣的內外壓力下，新二代不只要面對外在環境不友善的各種壓迫，更要與內心的自我懷疑拉扯，讓他們對於新二代的身份有更多複雜的情感和認同。

Young（1990）提出了五種針對社會團體的壓迫形式，包含了剝削、邊緣化、無權力、文化帝國主義及暴力。郭秋永（2012）整理 Young 的五種壓迫表示，「剝削（Exploitation）」為某一社會團體的勞動成果，成為另一優勢社會團體獲益的穩定過程，其中包含了種族、階級、性別等各種權力不均等的剝削；「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是指某一社會團體被排除在社會勞動的僱用與社會生活的參與之外，雖然可以獲得社會福利的救濟，但也會使他們失去自尊、自由、社交能力等最基本的需求；「無權力（Powerlessness）」是指缺乏工作自主權，只能從事勞力密集等低技術工作；「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指優勢文化不斷被大量傳播，成為普遍性的規範，展現並鞏固優勢文化的價值觀、目標等，相反的，弱勢文化與優勢文化所展現出的差異，則被定義為非我族類的「他者」，被建構為「偏差」與「劣等」；「暴力（Violence）」則為某一社會團體受到任意、屈辱性，卻被社會所容忍的人身攻


擊，包含肢體及言語上的暴力行為，然而，這樣的暴力行為在社會中已經司空見慣，只會受到輕微懲罰甚至沒有懲罰，形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容忍」，進而造成一種「社會實踐」。



如張錦華（2014）所言，族群壓迫是一種整體結構現象，上述的五種壓迫方式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關聯，如：經濟的剝削、權力的邊緣化、文化的污名化等等，皆屬於整體的結構性壓迫。而進一步來看，族群壓迫的結構包含了社會各方面的整體結構壓迫，以新二代女性為例，在她們身上可能同時包含了階層、性別或是種族等多重壓迫。因此，在訪問之中，將了解各種面向的結構，對新二代所造成的壓迫，以及讓社會了解，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所視為的必然或不自覺壓迫，是如何在新二代身上一再被生產和複製，藉此減少歧視的產生。

在這些壓迫的環境之下，新二代沒有因為父親是台灣人，而被視為多數群體，反而被放大母親的身份，被視為「雙族裔個體」（bi-ethnic individuals），甚至被歸類為「少數群體」（鍾才元、林惠蘭，2015）。根據 Bronfenbrenner（1986）的研究指出，跨國婚姻所生下的小孩，因為要面對文化衝突、語言等問題，承受了比一般家庭小孩更多的壓力，也比較不容易建立自我認同，甚至會因為遭受到同儕排擠，而產生適應困難的問題。

Posten（1990）所提出的「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描述如新二代的雙族裔個體，其自我認同的歷程是如何發展。此模式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學齡前的「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對於此階段的幼童而言，族群對於自我概念形成的影響很小；懂事後的兒童則進入第二個「族群類別選擇」(choice of group categorization) 階段，此階段的兒童容易面臨危機與疏離感，因此，鍾才元、林惠蘭(2015)提到，為了追求認同感或是進入某一個團體，進而選擇自己的族群分類。可能同時認同父母雙方的族群，或是認同其中一方較優勢的族群，這樣的認同選擇會受到族群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或是個人因素等影響；大約在進入青春期後，雙族裔個體會進入第三個「掙扎／否認」(enmeshment／denial) 階段，青春期的他們會因為族群身份而迷惘，甚至不被某些群體所接納，因而產生對自我認同的掙扎與否認，甚至會排斥、隱藏不同於主流族群的父母身份，但同時也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罪惡和氣憤；第四個是「欣賞」(appreciation) 階段，雙族裔個體開始認同身為雙族裔群體的特點，雖然仍傾向認同其中一個族群身份，但也轉而欣賞並學習雙邊族群的文化；最後第五個階段則是「整合」(integration)，他們逐漸認同身為雙族裔身份的價值，發展出安全且完整的自我認同。

新二代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完全線性、單一的模式，除了 Posten 所提出的「雙族裔認同發展模式」外，Kiang、Fuligni (2009) 認為，雙族裔個體會因為當下的同儕關係、社會氛圍或是所屬團體而做出有利自己的的身份認同。如馬藹萱(2005)的研究指出，新二代的多元族群認同會受到「外表」的影響，如果是擁有「非典型外表」⁴的新二代會更加傾向多元族群認同。例如：膚色較深的新二代，可能會常常遇到特別的注意，被標示出與一般台灣人的不同，不斷提醒他們身在台灣的「特殊性」；而沒有非典型外表的新二代則可以選擇「隱

⁴ 這裡的「非典型外表」是指相對於主流族群所認定的典型外表，「非典型外表」可能是膚色較深或是輪廓較深等等。

藏」或是「中和」自己的多元族群身份，融入在主流族群當中，避免種種可能的壓迫和歧視發生。



如前述所言，新二代對於外面環境及社會評價可能更加敏感，因此，當他們意識到新二代的身份是「包袱」時，多數可能會選擇避而不談或是隱藏自己的身份，只有在他們覺得安全、舒適和被接納的環境中，才能大方展現自己的身份；或是當他們的身份認同已經進入到「欣賞」(appreciation)及「整合」(integration)期，才能驕傲的展示身份並為其族群發聲。「新二代的包袱」亦是本報導要探討的重點之一，希望透過他們的自我闡述，了解在新二代的成長過程之中，是否因為其身份，經歷了比一般小孩更多的歧視與壓迫？而當外籍「新娘」都已經變成「老娘」⁵之時，她們的「問題」⁶是否依舊存在成為新二代們的包袱？這些都將是本報導要探討的問題。

⁵ 此為借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一書中的形容。

⁶ 此「問題」為前述中，台灣社會將新移民配偶視為「社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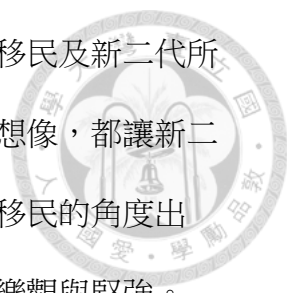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報導規劃

第一節、章節規劃

本深度報導論文以「新二代的生命經歷」為主軸，並順著他們生命的時間軸，由童年走入校園最後進入社會；由隱藏身份到自我尋根；由社會問題到成為南向人才。在新二代的生命歷程當中，雖然面臨了相同的問題並擁有共同的回憶，但每個人的心境卻大不相同，希望藉由章節的鋪成，感到新二代多元的心路歷程和轉變。

由第一章的童年記憶出發，還原當他們第一次因為媽媽的身份，而受到歧視時的感受。第二章則是描述，當新二代開始意識到自己到自己所受的差別待遇，是因為來自媽媽的身份時，他們如何看待媽媽。而這一切的差別待遇，主



要是來自於台灣對於東南亞的歧視。在第三章當中，將點出新移民及新二代所受歧視的根源，不論是對於東南亞文化的不尊重，或是貧窮的想像，都讓新二代更加難以融入社會。除了新二代的角度外，第四章則是從新移民的角度出發，了解在妻子與母親角色背後的辛酸，並從她們身上學習到樂觀與堅強。

從第五章開始，新二代開始逐漸走出負面形象的陰霾，不只撕掉「遲緩兒」標籤，更因為社會風氣的轉變，可以在學校大方做自己；在第六章中，則可看見反思身份後的新二代，是如何尋根以及尋找自我，不只改變了他們的身分認同，與媽媽間的感情也更為親密。

最後兩章，希望從十幾年前，拉近看看這兩三年內的社會現況。第七章的南向列車啟動後，不只引發台灣對於東南亞的熱潮，更將新二代的曝光率推上高峰。雖然社會對於新二代的評價改善了，甚至給予過高的期待和關注，但在第八章中，寫出新二代想要的，只是成為一個「普通人」，更希望有一天這些帶有優劣之分的標籤可以永遠消失。

第一章：新台灣之子難忘童年

這群由東南亞配偶所生的孩子，不被稱為混血兒，而是「新二代」或是「新台灣之子」。這樣的差異讓新二代在初次與同儕相處時，因外表、口音或是他們的媽媽，而被貼上不一樣的標籤。

本章重點在於藉著若干新二代的童年記憶，還原他們的成長過程，探討最初所

面臨的歧視，對他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章：我的媽媽不一樣

當新二代意識到母親的身份與一般人不同時，有些新二代視為理所當然，並欣然接受；有些人則因為外界的眼光，排斥甚至討厭媽媽的身份。但相同是，他們心裡都愛著媽媽，並將媽媽視為心裡最柔軟的那一塊。

本章重點在於呈現出新二代心中的母親樣貌，不論是令他們驕傲的超人媽媽；或是受到親友歧視，令他們想保護的媽媽。從新二代的角度出發，將新移民身為妻子、媳婦或是母親的喜悅與辛苦一一呈現。

第三章：平視東南亞：解開歧視的枷鎖

新二代身上所背負的包袱自來新移民，而新移民身上的包袱則是來自台灣對於東南亞的歧視。不論是貧窮的想像，或是自以為是的高低之分，都成為新移民或是新二代所要背負的原罪。

本章重點在於點出歧視的根源，是長期以來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解。無論是赤裸裸的歧視，或是無知的偏見，甚至是承襲自媽媽身上的包袱，都讓新二代們更加難以融入這個社會。



第四章：不該承受之重

「就算拿到身分證，我也不被看作台灣人。」這是一位新移民媽媽的告白。在嫁來台灣之前，她們皆懷抱著夢想，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或是親近台灣的文化。然而，當她們成為台灣媳婦後，不但要面對社會不友善的眼光，更必須在自我與家庭之間作出平衡甚至犧牲。

本章在於呈現新移民身為妻子與母親的心路歷程，以及當她們的孩子因身份而受到歧視時，她們的處理方式。她們的勇敢與樂觀，不只帶領自己走出歧視的陰霾，更影響孩子，讓他們為自己的跨文化優勢感到驕傲。

第五章：撕下新二代的負面標籤

「新二代遲緩兒」這樣的新聞標題一度廣為各家媒體所用，造成新二代被貼上遲緩、功課不好、競爭力差等負面標籤。雖然之後有許多研究都未新二代平反，但那些負面的形象至今依舊存在。

本章重點在於走入校園，了解當前的國小新二代，是否仍受到負面標籤的影響。慶幸的是，隨著多元教育的倡導與東南亞文化的認識，現在的新二代不再被視為問題學生，多數的他們更對自我身份大方承認，撕除以往的負面標籤。

第六章：拾起媽媽的文化

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越來越多新二代開始正式自己的身份，甚至出現天生的

「東南亞迷」，不但為媽媽感到驕傲，更積極想要融入媽媽的文化。但對於曾經無視、或是沒有機會接觸媽媽文化的新二代而言，不論是學習媽媽的語言、家鄉料理或是聽聽媽媽的故事，都讓他們感覺自己與媽媽更加親近。



本章重點在於討論新二代為何開始「尋根」，以及「尋根」後，對於自我認同或是東南亞文化認同有什麼轉變。

第七章：南向列車啟動後

自從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後，這輛嶄新的火車頭不只帶動東南亞熱潮，更讓社會目光轉移到新二代身上，期望他們成為前進東南亞的尖兵。在南向列車啟動後，有些新二代企圖利用自己跨國籍的優勢，主動精進東南亞語言，為前進東南亞工作做打算；有些則不為所動，希望深耕台灣或是往其他國家發展。

本章重點將在於討論南向列車啟動後，對於新二代的影響。雖然他們樂見台灣開始重視東南亞，但更希望在利益之外，台灣能真心、平等的看待東南亞。

第八章：我們不一樣 我們也一樣

「我是台灣人。」是每個新二代被問到身份認同時，不變的答案。從搖籃到社會，這群新二代走了將近 20 年，從原本的遲緩兒，脫胎換骨成為炙手可熱的南向人才。但多數的他們並不喜歡這樣的注視與期待，「只想成為一個普通人」

才是他們共同的心聲。



本章重點在於歸納近 20 年來，新二代所感受到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變化，並與現在的新二代處境做比較。他們皆認為，雖然仍有刻板印象未消除，但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尊重，是他們可以確切感受到越來越好的部分。他們也衷心期盼，烙印在新移民、新二代身上的負面印記可以永遠消失。

第二節、報導對象

本深度報導論文的預計採訪對象：

一、新移民二代

此為本深度報導論文的採訪核心人物。藉由訪談新二代，了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因為新二代的身份而經歷了什麼樣的心路歷程。

二、新移民二代周邊人物

藉由訪談新二代的媽媽、師長或是親友，從不同視角了解新二代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們是如何看待新二代。

三、專家學者

提供新二代的各種面向的見解及建議。

第三節、採訪名單

| 姓名 | 個人背景 | 採訪日期 |
|-----|---------|-----------|
| 張鈺惠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3/10 |

| | | |
|-----|------------------|-----------|
| 張慧玲 | 女，越南新二代 | 2016/3/10 |
| 張辰嘉 | 男，泰國新二代 | 2016/3/12 |
| 陳瑾 | 女，菲律賓新二代 | 2016/3/19 |
| 張正 | 男，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 2016/4/1 |
| 徐樺姿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4/3 |
| 小逸 | 女，泰國新二代 | 2016/5/12 |
| 楊麗娟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5/16 |
| 陳又津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6/21 |
| 徐政民 | 男，印尼新二代 | 2016/7/7 |
| 曾郁晴 | 女，越南新二代 | 2016/7/9 |
| 黃惠美 | 女，越南新二代 | 2016/7/9 |
| 謝文強 | 男，印尼新二代 | 2016/7/10 |
| 蔡宇傑 | 男，越南新二代 | 2016/7/11 |
| 賴邦晨 | 男，中國新二代 | 2016/7/13 |
| 陳允萍 | 男，台東移民署專員 | 2016/7/16 |
| 陳子琦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7/19 |
| 江秀娟 | 女，桃園壽山國小老師 | 2016/7/19 |
| 潘琳燕 | 女，越南新二代 | 2016/7/21 |
| 劉依婷 | 女，印尼新二代 | 2016/7/21 |
| 陳琳鳳 | 女，越南新移民 | 2016/8/5 |
| 何鵬 | 女，中國新移民 | 2016/8/17 |
| 蔡易珊 | 女，泰國新二代 | 2016/8/17 |

| | | |
|--------|--------------------|------------|
| 呂曉倩 | 女，菲律賓新二代 | 2016/8/17 |
| 王小桃 | 女，中國新移民 | 2016/8/30 |
| 丁安妮 | 女，印尼新移民 | 2016/9/8 |
| 林佳儀 | 女，中國新二代 | 2016/9/23 |
| 蔡宜汝 | 女，菲律賓新二代 | 2016/10/2 |
| 何景榮 | 男，印尼新二代 | 2016/10/12 |
| 竇少彤 | 女，台商學校老師 | 2016/10/12 |
| 馮涵棟 | 女，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 2016/10/13 |
| 蘇郁琿 | 女，新北市福營國中老師 | 2016/10/17 |
| 王翊亘 | 女，新北市福營國中老師 | 2016/10/17 |
| 吳毓瑩 | 女，國北教大教育學院院長 | 2016/10/18 |
| 李志芬 | 女，新北市福營國中輔導處主任 | 2016/10/19 |
| 陳志強 | 男，台北市忠義國小教輔處主任 | 2016/10/19 |
| 林麗蟬 | 女，柬埔寨新移民，現任立委 | 2016/10/24 |
| 小家（化名） | 越南新二代 | 2016/11/7 |
| 陳鳳鳳 | 女，越南新移民，政大越南文講師 | 2016/11/12 |
| 林淑瑀 | 女，台灣人，東南亞語系學生 | 2016/11/14 |
| 洪銘謙 | 男，台灣泰國文化暨語言交流協會秘書長 | 2016/12/9 |

參考文獻



內政部戶政司（2003），《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摘要報告》。上網日

期：2016年2月20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內政部戶政司（2016），《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原屬國籍(按登記及發生)》。

上網日期：2016年2月20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內政部戶政司（2016），《縣市結婚按性別及原屬國籍(按登記)》。上網日

期：2016年2月20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王彩鸞（2015年2月22日）。〈新住民子女 入學資料不敢填媽媽國籍〉，《聯合晚報》。上網日期：2016年1月17日，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

[%E6%96%B0%E4%BD%8F%E6%B0%91%E5%AD%90%E5%A5%B3-](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E6%96%B0%E4%BD%8F%E6%B0%91%E5%AD%90%E5%A5%B3-)

[%E5%85%A5%E5%AD%B8%E8%B3%87%E6%96%99%E4%B8%8D%E6%](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E5%85%A5%E5%AD%B8%E8%B3%87%E6%96%99%E4%B8%8D%E6%95%A2%E5%A1%AB%E5%AA%BD%E5%AA%BD%E5%9C%8B%E7%B1%8D)

[95%A2%E5%A1%AB%E5%AA%BD%E5%AA%BD%E5%9C%8B%E7%B1](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E5%A2%E5%A1%AB%E5%AA%BD%E5%AA%BD%E5%9C%8B%E7%B1%8D)

[%8D](http://udn.com/news/story/6885/715240-%E5%A2%E5%A1%AB%E5%AA%BD%E5%AA%BD%E5%9C%8B%E7%B1%8D)

田仁傑（2007）。《歧視「外籍新娘」和「大陸新娘」言論之管制倡議—從批判種族理論觀點出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台灣東南亞學刊》，3（1）：3-36。

李昭安（2015年7月25日）。〈新住民二代 移民署培育有成〉，《聯合報》。上

網日期：2016年1月17日，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078152-](http://udn.com/news/story/7314/1078152-%E6%96%B0%E4%BD%8F%E6%B0%91%E4%BA%8C%E4%BB%A3-%E7%A7%BB%E6%B0%91%E7%BD%B2%E5%9F%B9%E8%82%B2%E6%9C%89%E6%88%90)

[%E6%96%B0%E4%BD%8F%E6%B0%91%E4%BA%8C%E4%BB%A3-%E7%A7%BB%E6%B0%91%E7%BD%B2%E5%9F%B9%E8%82%B2%E6%9C%89%E6%88%90](http://udn.com/news/story/7314/1078152-%E6%96%B0%E4%BD%8F%E6%B0%91%E4%BA%8C%E4%BB%A3-%E7%A7%BB%E6%B0%91%E7%BD%B2%E5%9F%B9%E8%82%B2%E6%9C%89%E6%88%90)

林金惠（2005）。〈我的孩子並不笨〉，夏曉鵬（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22-25。台灣：左岸文化。

林照真（2004）。〈我不笨，我只要求公平對待〉，《天下雜誌》。第304期。

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配偶」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配偶」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夏曉鵬（主編）（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灣：左岸文化。

徐榮崇、徐瑞雲（2007）。〈從跨國主義談臺灣外籍新娘及第二代的鄉土認同—以蘆洲市某國小為例〉。《課程與教學》，10(1)：43-63。

馬藹萱（2005）。〈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2005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臺北：臺灣社會學會，11月19-20日。

張錦華（2014）。《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學—以原住民族為例》，台北：黎明文化。

教育部（2015）。〈教育部103學年度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son_of_foreign_103.pdf

莫藜藜、賴珮玲（2004）。〈臺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

《社區發展季刊》，105：55-65。

郭秋永（2012）。〈社會正義、差異政治、以及溝通民主〉。《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24(4)：529-574。

陳芬苓（2014）。〈女性新移民生活狀況的轉變與政策意涵〉。《東吳社會工作學

報》，(27)：29-59。

陳逸思（2004）。〈外籍媽媽遲緩兒〉，《時報週刊》。第 1372 期。取自

<http://www.bethlehem.org.tw/big5/early.asp?action=detail&id=76>

曾伯愷（2015 年 5 月 9 日）。〈地表最強人是母親 外配母苦盡甘來成老闆

娘〉，《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6 年 1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50509/607194/%E5%9C%B0%E8%A1%A8%E6%9C%80%E5%BC%B7%E4%BA%BA%E6%98%AF%E6%AF%8D%E8%A6%AA%E3%80%80%E5%A4%96%E9%85%8D%E6%AF%8D%E8%8B%A6%E7%9B%A1%E7%94%98%E4%BE%86%E6%88%90%E8%80%81%E9%97%86%E5%A8%98/>

曾熾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61）：73-107。

廖元豪（2006）。〈全球化趨勢中婚姻移民之人權保障：全球化、台灣新國族主

義、人權論述的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4(3)：81-129。

趙彥寧（2004）。〈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

案例〉。《台灣社會學刊》，32：59-102。

蕭長展（2016 年 4 月 18 日）。〈外配歸化國籍需「品行端正」？ 尤美女：大老

闆三妻六妾就可以？〉，《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6 年 5 月 3 日，取自

鍾才元、林惠蘭（2015）。〈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之子女在族群自我認同與族群態度上之表現〉。《人口學刊》，(51)：95-134。

藍佩嘉（2004年7月）。〈外籍新娘不是不停下蛋的母雞〉，《新新聞》，第906期：46-47。

藍佩嘉（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34)：1-57。

藍佩嘉（2012）。〈性別與跨國遷移〉。收錄於《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二版，黃淑鈴、游美惠編，第十二章，高雄：巨流。

顧荃（2015年3月8日）。〈進口外配說 柯文哲：沒有惡意〉，中央社。上網日期：2016年1月19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3085008-1.aspx>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723-742。

Delgado, R. (1982), Words that wound: A tort action for racial insults, epithets, and name-calling, 17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133-181.

Kiang, L. & Fuligni, J. (2009). Ethnic identity in context: Variations in ethnic exploration and belonging within parent, same-ethnic peer, and different-ethnic pe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the Youth Adolescence*, 38: 732-743.

Poston, W. S. C. (1990). The Bira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 A Needed Addi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9(2), 152-155.

Young,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